

「共同在場」下的跨國母職實作： 東南亞籍移工的情感聯繫和身分管理*

張芷瑄**

投稿日期：2024 年 12 月 2 日；通過日期：2025 年 4 月 18 日。

* 謹以本文獻給田野中的移工媽媽／朋友們，感謝他們慷慨地接納我進入他們的世界，無私分享生命故事。雖然文字難以盡述他們給予我的溫暖與信任，我仍期望本文能讓更多人看見並理解移工的日常處境。本文改寫自作者之學士論文，特別感謝黃克先教授的悉心指導，藍佩嘉教授與吳嘉苓教授於口試中所給予的提醒與建議，劉仲恩教授與陳東升教授也在寫作過程中給予莫大協助。本文初稿曾於 2023 年臺灣科技與社會學會年會發表，受惠於與會者的意見。最後，感謝三位匿名審查人和編委會的寶貴修改建議，使本文更加完善。

**張芷瑄為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系碩士生，研究領域為國際遷移、性別、種族與族群不平等、質性研究方法，E-mail: chihhsuan.ntusoc@gmail.com。

本文引述格式：

張芷瑄 (2025)。〈「共同在場」下的跨國母職實作：東南亞籍移工的情感聯繫和身份管理〉，《新聞學研究》，164，109-163。https://doi.org/10.30386/MCR.202507.0013

《摘要》

女性移工遠赴海外支撐家計，也肩負著來自母國家庭對子女教養的性別角色期待。透過田野工作和深度訪談，本文討論東南亞籍移工媽媽如何運用通訊科技實作跨國母職，並反思科技對遠距關係的影響。延續先前學者指出移工的母職實作核心為「製造共同在場」，即經由訊息、通話、視訊等管道協助，將存在感投射回母國家庭中，鬆綁距離對情感的限制。基於此，本研究進一步概念化出「掌握性的共在」及「陪伴性的共在」兩種互動模式，並指出母親職業類別與子女的年齡是影響母職實作的重要因素，母親對教養的期望也會進一步塑造其策略。

然而，研究者若一味按照移工媽媽的說法來描述跨國母職，容易把跨國交流本身，簡化為家庭關係穩定和美滿的象徵。除了「做媽媽」，移工們也將社群媒體變為展演母職的前／後臺，選擇性地隱瞞或呈現特定資訊，以表達自己的承擔與犧牲，藉以獲得從事個人休閒娛樂的彈性。本文也以移工媽媽在臺建立親密關係的案例，探討她們在多重身分之間的協商與平衡。本文強調，在理解跨國母職不同的實作策略之餘，也需拆解傳統母親身分的框架，才能理解移工所面對的複雜性，以及通訊科技為跨國情感聯繫帶來的多重面向。

關鍵詞：共同在場、身分管理、東南亞籍移工、通訊科技、跨國母職

壹、前言

在這裡工作太苦了，還常常要遇到那些不好的雇主……但最苦的是我們要離開小孩。我都很想他們，晚上想到還會哭，你看他們也是想我，常常說：「媽媽你不要工作了，你回來，沒錢也沒關係。」我聽到就很難過，我沒辦法，我也想回去，可是要工作才可以幫我的小孩。（印尼看護工，妮雅）

滬夏午後，正值工作轉換期的印尼移工妮雅在安置中心與其他移工閒聊。¹ 她的手機螢幕突然顯示女兒撥來的視訊，急忙接通後，簡單詢問女兒今天的狀況並分享瑣事，過程中也不忘將鏡頭轉向在場其他人，讓大家和她女兒打招呼、參與對話。然而，在掛斷電話不久，方才的輕鬆和歡快隨之消散，跨國距離在視訊通話的對應下變得更加鮮明，失落感再次席捲而來，失去工作收入的焦慮也讓妮雅更難以忍受。當她再次開口說出上述這段話時，已經語帶鼻音、眼眶泛淚。

自 1990 年代正式開放移工入臺，東南亞籍移工人數逐年增長，為產業和社福領域貢獻諸多心力，也推動了移工在臺處境的討論（曾嫵芬，2004）。然而，學界對移工的探問，大多圍繞於勞動狀況和在臺生活經驗（林津如，2000；夏曉鶯，2002, 2005；藍佩嘉，2002），母國家庭的情況則隱身其後，鮮少能被看見與討論。實際上，遷移經驗所涵蓋的不只是單一的地理空間，而是受到跨國間多重身分和位置的影響。妮雅的故事便揭示了女性移工在跨國社會場域下所面臨的挑戰，各人的

¹ 本文提及之移工皆以化名呈現。

遭遇及程度或有抽換，但都面對著經濟利益和家庭親情抽換的難題，必須平衡工作和家庭角色的衝突，一面煩惱自己在臺灣的工作和溫飽，一面將心思懸在母國子女身上，擔心子女會因地理距離而疏離，設法維繫和履行母親角色。由此，移工媽媽和子女的分離寫照，凸顯了她們在工作／家庭、母國／目的國之間的掙扎拉扯。

遷移學者近年提倡跨國狀態（transnationalism），強調人們即便身在異鄉也會同時和母國保持聯繫，故而社會互動是由跨國形構、鑲嵌和影響（Levitt, 2001; Levitt & Jaworsky, 2007; Levitt & Schiller, 2004）。正如女性移工雖然跨越地理與性別的鴻溝，成為家中的經濟支柱，仍無法卸除母國家庭對她們的母親角色期待，是而同時維持和子女的遠距連帶，並發展出性別期待和遷移經驗交疊的跨國母職（transnational motherhood）。為了彌補肉身缺場，本研究所接觸的移工媽媽們肯定地表示，資訊與通訊科技（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是她們跟小孩互動的媒介，也是能夠維持跨國狀態的關鍵，可見跨國母職的意涵與實作相當程度地凝聚於科技使用上，圍繞著訊息、通話、視訊等不同方式，織起異地相隔的家庭生活。過往研究也談及移工媽媽使用通訊科技和母國家庭維持聯繫，如藍佩嘉（2008）在專書《跨國灰姑娘》中指出移工會穿梭在不同社會空間中進行角色轉換，使用行動電話來維持「遊牧式親密關係」，用打電話、傳簡訊的方式來履行母親身份。

隨著主流科技媒介的轉變和社群媒體興起，移工媽媽得以即時跟母國家庭接軌。與此同時，也有生活瑣事被攤開在網路上檢視，使她們在臺生活幾乎無所遁形。移工媽媽的科技使用，已不再僅是過去為了保持聯絡的工具，而是涉及不同樣態的展演與資訊交換策略。研究者若忽略移工媽媽在跨國交流中是有意識地從中選擇交流方式及內容，更容易將

通訊聯繫簡化為家庭關係穩定與美滿的象徵，進而將移工母親描繪為單一面向的無私奉獻者。Parreñas（2001, 2005）和梁莉芳（2024）雖然指出，移工媽媽透過經濟匯款來重塑母職，使自己同時承擔教養者與養家者的角色，這些研究也確實擴展了母職的內涵，但仍未能跳脫移工媽媽因家庭責任而出國工作的框架。

本文則進一步指出，移工媽媽不僅投入家庭責任，在家庭以外也擁有個人生活。部分移工媽媽與丈夫長期分居或正式離婚後，在臺灣建立新的親密關係，或是在工作之餘追求娛樂與休閒。這些個人生活，並不意味著她們對子女的付出較少，而是展現出母職的複雜性——移工母親不只是為了家庭而犧牲自我，而是在多重身分之間協商與平衡。移工媽媽在臺灣建立的親密關係，在過去的研究中鮮少被提及，甚至被迴避，而本文提出具體的田野資料和訪談，補足此缺口，提供更細緻的視角來理解跨國母職的實作。

本研究在田野中所看見的移工媽媽，既是在手機螢幕前關心子女的慈母，也會把握難得的休假日，與朋友相約縱情跳舞唱歌，或和在臺灣認識的新伴侶相互支持。女性移工不全然遵照外界認定的「理想母親」之路，也會有私密的個人生活，其中或多或少是溢出母職框架的行為。研究者該如何理解移工媽媽的異質面貌？移工本人如何維持母親角色跟跨國親子關係？又如何管理可能被指摘為母親失格的行為？當社群媒體的鎂光燈打在移工的日常生活上，管理或隱藏不同資訊的技巧，是跨國母職中伴隨科技發展而來的新挑戰，也是過往研究未能觸及的部分。在此，多元科技媒介及隨之被檢視的繁雜資訊，究竟是加固跨國關係，抑或是因資訊過度揭露而變得更脆弱，有待研究者進一步追問。

過往跨國母職研究，大多聚焦於看護工的經驗。一來是因早期的女性移工大多在全球照顧鏈（global care chains）中，擔負中產階級外包的

照護工作（Parreñas, 2001）。二來則是因為看護工工作的再生產勞動性質，與女性的母國家庭責任重疊，論者認為這會一定程度地排擠看護工的母職實作（梁莉芳，2024；藍佩嘉，2008；Hondagneu-Sotelo & Avila, 1997）。而今，在臺女性移工中，已有近四成為廠工，²不少家庭看護工也有意願轉換工作類別至廠工（Lan, 2022）。不過，目前有關在臺之女性移工的研究，仍缺乏系統性地比較不同職業類別的差異。家庭看護工和廠工的工作性質，乃至客工體制下對移工勞動力的監控方式，皆會影響移工的生活調度。透過不同職業的比較，本文既剖析勞動規範如何形塑母職，也強調跨國交流並非在真空的環境下進行，而是有賴於移工跟日常工作協商。

本文以民族誌和訪談所獲得的經驗案例為本，呈現移工媽媽在跨國狀態下的多面向實作，跳脫理想母職的單一描述。在不同科技媒介共構下，本文指出「製造共同在場」是跨國實作母職的重點，並進一步概念化兩種不同的互動邏輯，涵蓋互動特性、日常工作性質、子女年齡等因素。另一方面，也挑戰社會對女性和母親角色的想像，針對溢出理想母職框架的行為，探討移工媽媽是如何管理資訊來維護不同身分之間的界線，甚至讓科技成為母職情境表演的一環。綜合以上討論，本文反思新興通訊科技在跨國關係維繫中扮演的角色，以及個人管理身分資訊的應對策略。

² 資料來源：重要性別統計資料庫，行政院性別平等會。取自 https://www.gender.gov.tw/gecdb/Stat_Statistics_Query.aspx?sn=liG%24CzeS9IKqCrTOifedlQ%40%40&statsn=S2fh9YSaNs4RmUnkivB51A%40%40

貳、海外移工的母職重塑：文化規範、階級差異與跨國實作

一、海外移工歷程及母親角色框架：印尼及菲律賓

乘著遷移浪潮的推移，越來越多女性成為遷移者，前往海外探尋工作機會，以求改善家庭生活條件（藍佩嘉，2007；Oishi, 2005）。對於育有子女的移工來說，家庭牽絆則又是另一個沉重的包袱（梁莉芳，2024；藍佩嘉，2008）。Glenn et al.（1994）提出母親角色落腳於特定歷史和社會建構下的性別秩序，凸顯溫柔、細心的刻板印象，被形塑成孩子首選的主要照顧者。為了回應社會期待、避免落入自責或被咎責的窘境，移工媽媽也在遷移的狀態下凝聚出跨國母職——不僅在離家前就得為孩子做好打算，離家後也必須時刻聯繫、留意，維繫親子間的情感羈絆，替孩子的未來鋪路（Chib et al., 2013; Madianou, 2012; Parreñas, 2000, 2001, 2004, 2005）。本節將說明印尼和菲律賓的勞動力輸出歷程，並納入兩國社會文化對母親角色的期待，探討遷移政策和性別意識形態交互影響的效果，以理解遷移和母職框架如何形塑印尼及菲律賓女性移工所經歷的實作困境。

有關印尼母職的研究指出，印尼社會所崇尚的「好媽媽」價值觀與西方略有不同。印尼母親不僅是子女的教養者，更被視為國家人口的孕育者（Suryakusuma, 1996）。社會期待女性承擔家庭責任、提供愛與安全感，並認為母親應以耐心陪伴子女。在這樣的框架下，母親最重要的工作便是提供子女適當的情感照護，養育子女也被視為女性對社會的貢

獻 (Dewi, 2011)。

不過，自 1980 年代起，印尼政府開始積極鼓勵農村低收入女性從事海外家務勞動，試圖將女性勞動力納入國家的經濟發展戰略 (Chan, 2017; Irawaty, 2021; Lam & Yeoh, 2016)。此政策與印尼既有的文化規範及父權家庭型態有所矛盾。在蘇哈托政權的大力推動下，國家母性主義 (state maternalism) 成為女性角色的核心框架。印尼女性移工被塑造成為國家和家庭犧牲的賢妻良母，政府亦透過宗教論述將跨國勞動合理化，將她們的經濟貢獻重新詮釋為對家庭與國家的愛與責任 (Lam & Yeoh, 2016; Silvey, 2007)。隨著女性移工人數增加，她們的實踐逐漸改變家庭關係與母職的意涵，母職圖像從過去以「陪伴」為核心，逐步擴展至「養家者」的角色。然而，即便女性移工透過經濟支持家庭，她們仍然被期待維持母職責任，並承受來自社會的道德審視，擔心自己被視為失職的母親。

菲律賓的遷移歷程不同於印尼，但女性也面臨類似的困境。1970 年代以來，菲律賓政府積極推動海外就業政策，將海外工作視為緩解經濟困境的策略；1974 年的勞工出口政策，確立了政府對海外就業的管理框架。起初，輸出移工只是權宜之計，但隨著全球勞動市場的開放，菲律賓的海外移民模式不僅持續發展，更成為國家經濟的重要支柱。政府也以「國家英雄」的稱號來肯認外籍移工的貢獻。其中，女性移工的比例尤為顯著；1992 年起，女性人數甚至超過了男性 (Ballaret & Lanada, 2022)。菲律賓女性在跨國家務勞動和護理工作領域占據重要的地位，但作為母親，她們也經歷著跟子女分離的痛苦 (藍佩嘉, 2008)。有關菲律賓的文化與家庭研究，大多強調親屬關係和家庭的地位 (Asis et al., 2004)，母親更被稱為「家庭之光」 (Ilaw ng tahanan)，被認為是天生的照顧者 (Asis et al., 2004; Madianou & Miller, 2013)。乍看之下，菲

律賓社會對家庭社會價值的強調，似乎與國家鼓勵女性移工相悖；事實上，在海外賺錢供養家庭，往往是女性遷移的原因。不過，與印尼移工相同，菲律賓女性移工的母親角色也在遷移過程中被挑戰，使得菲律賓媽媽們必須不斷保持跨國交流狀態，以達到社會所期待之對子女的情感支持（Tiamzon-Abiera, 2024）。

印尼和菲律賓兩國的海外移工發展歷程雖有不同，但在家庭角色分工上仍展現出相似的性別規範，教養子女皆是性別化的工作。來自菲律賓的社會壓力，不斷呼喚著移工回應母職責任，印尼政府則是更進一步透過國家或宗教論述強調女性在家庭內的責任。儘管前往海外工作已成為普遍接受的策略，文化仍持續透過傳統父權家庭與性別意識形態，將女性限制在特定性別腳本之中，以避免女性完全取代男性的主導角色或「拋家棄子」。因此，當焦點轉向家庭內的性別角色時，兩國女性移工都須回應理想化女性家庭角色的論述，相似的遷移動機與性別文化框架亦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兩國母職實作上的明顯差異。

二、階級化的母職矛盾及跨國實作策略

社會雖然期望女性扮演好媽媽的角色，母職卻絕非同質的樣板，而是交織著階級和資源的現實困境。不同於中產階級家長以各種課外活動來培養子女的潛能（Dow, 2019; Lan, 2018; Lareau, 2003; Warikoo, 2022），勞工階級家長雖也想為孩子打造保護網，卻迫於生計壓力而得在外奔走賺錢。這些媽媽們疲於應付經濟缺口，也難以支撐環環相扣的密集育兒安排。勞工階級家長最擔心的，莫過於經濟弱勢的陰影會繼續糾纏下一代，不願孩子繼續從事辛苦的勞力工作。因此，他們也重視階級流動力，試圖用外包教育來彌補不足，期望在教育體制裡獲得競爭的

技能和機會（藍佩嘉，2014）。研究已指出，勞工階級在資源獲取上仍感到力有未逮，未能安放於主流教養腳本的評價框架，面臨階級化的教養矛盾。³ 其中，移工媽媽的情況更是如此，當他們為了賺錢，不得不離家工作多年，便偏離了在家照顧孩子的母職期待，遭致失職、不適任的道德譴責（藍佩嘉，2014；Suárez-Orozco et al., 2002）。於此，移工媽媽所面對的教養難題，不僅反應著育兒焦慮，也是有限資源下的階級劣勢。

在此，移工媽媽雖是為了獲取更多資源而遠赴海外工作，但遷移行為不該被看作純然的經濟利益驅使（梁莉芳，2024；Fresnoza-Flot, 2009; McKay, 2007）。誠如梁莉芳（2024）指出海外工作本身即是母職實作的一部分，當移工媽媽說明出國動機時，表面上或許指向經濟誘因，細究卻會發現，出國實是有限資源下的經濟盤算。對移工家庭而言，教育機會是翻轉階級的施力點，讓子女找到穩定的工作，不必受家庭社經地位牽連；而出國工作正是想為孩子提供升學機會，或預先存下教育基金。移工媽媽重塑且擴寫了母職的意涵，以更為積極的方式串接工作和母職，藉著經濟與教育資源的轉換邏輯，讓遷移本身被整併入母職實作。

雖然已努力組裝現有資源，但成為理想媽媽的母職焦慮，在跨國距離、工作和教養責任的矛盾之下，一再被催化。為了彌補肉身缺場，移

³ 中產階級價值和主流教養腳本有一定的親近性（affinity）。當代教養腳本傾向重視孩子的成長發展，要求父母積極參與及規劃，有責任打造孩子快樂成長的童年；而中產階級母親亦受密集母職（intensive mothering）的意識形態影響，強調以孩子為中心，需要母親投入長時間且密集的陪伴與教育（Hays, 1998）。相對地，勞工階級家庭卻遭經濟困境和教養期待雙重夾擊，被指責是以賺錢優先、忽視子女需求的失格父母，即便想要訴諸教育制度的幫助，也缺乏文化資本來辨別資源適切與否（藍佩嘉，2014, 2019）。

工媽媽透過定期匯款、購買禮物等方式來傳遞關切之情（Hondagneu-Sotelo & Avila, 1997; Parreñas, 2001, 2005），但這樣的作法也容易落入關係商品化的風險（Parreñas, 2005）。另則，因為距離的阻隔，移工媽媽無法獨挑大樑，需要和家中的女性長輩一同協作母職，仰賴她們作為第三隻眼。過往研究亦提到，身在海外的媽媽不得不仰賴母國照顧者，卻也擔心自己的地位會被取代，是而深感威脅和挫折（梁莉芳，2024；Chib et al., 2013; Gorfinkiel, 2011）。

跨國母職研究雖已累積出一定程度的發展，卻有兩個普遍的缺憾：其一，研究者著重討論單一工作類別，未能看見不同職業類別如何形塑母職條件（梁莉芳，2024；Hondagneu-Sotelo & Avila, 1997; Parreñas, 2001, 2005）。其二，研究者竭力描繪移工想成為「好媽媽」的面向，忽略家庭外的生活，移工的婚外親密關係更是研究較少正面討論的內容（梁莉芳，2024；藍佩嘉，2008；Hondagneu-Sotelo & Avila, 1997; Parreñas, 2001, 2005）。

針對看護工的研究，已點明照護工作的特性。Hondagneu-Sotelo & Avila（1997）表示看護工承擔私人家戶中的再生產勞動，工作性質可能會排擠移工本人的家庭責任。梁莉芳（2024）則認為看護工為隱形工作，較難得到對應的回報，家戶內的權力不對等會讓看護工的勞動條件更加艱難。這些性質反映出看護工所面臨的處境，卻未能涵蓋不同職業的其他移工。在臺灣的客工體制下，不同職業類別的移工被納入不同管理模式，以便達到最有效的監督。看護工受僱於家戶，工作與生活空間重疊，並受到與雇主之間不對等權力關係的約束。廠工則被集中安排至宿舍與工廠一帶，經由排定的班表、生產線上領班的監督，以及下班後的門禁、集體住宿，將勞動力控制在特定生產空間之內。工作性質和實際工作之場域，形成移工實際面對的日常處境，也造成不同的跨國交流

困難。本研究將闡明廠工和看護工的工作狀況，並討論移工媽媽如何據此重作母職，又如何是在受限的時間與空間內維繫跨國家庭關係。

另外，跨國母職研究大多聚焦於移工母親如何竭盡全力「做媽媽」，從匯款、提供教育機會、通訊交流，再到將出國工作整併入母職意涵，無一不在強調她們如何回應家庭中的母親角色（梁莉芳，2024；Hondagneu-Sotelo & Avila, 1997）。然而，這樣的討論強化了社會期待中的「好媽媽」模板，也忽略了母職的複雜性，特別是移工母親在家庭之外的個人生活。本研究嘗試補足此盲點，討論移工媽媽在家庭外的個人生活——尤其是在臺灣發展的親密關係——以及她們如何在母職與個人情感需求之間協商。

移工媽媽在臺灣的生活不僅限於工作與家庭責任，休假日也會和朋友外出郊遊，或是與伴侶共享親密時光。這裡的伴侶指的並非子女生父，而是長期分居後的婚外親密關係，或正式離婚後的新伴侶。不過，就如同此面向經常被研究者忽略，這也是移工媽媽們極不欲為孩子所知的面向。她們擔心額外的親密關係，會破壞和孩子的關係，讓孩子懷疑自己出國工作的動機（藍佩嘉，2008）。本文在肯認移工媽媽個人生活的前提下，進一步探討她們如何在不同角色之間取得平衡：當母職的社會期待與個人情感需求產生矛盾，導致她們偏離理想母職的範疇時，她們如何管理資訊，維持在子女面前的形象？藉此，本文不僅挑戰了母職的單一敘述，也提供了更細膩的視角來理解移工母親的生活經驗。

移工媽媽的跨國母職策略，主要受到兩個要素影響，一是工作類別和勞動條件，二是子女的年齡。實作絕非僵固不變，移工媽媽需要不斷調整、變通和協商。甚者，實作背後的意義，乃至母親們自身所嚮往的母職形象，都是在一次次的考驗中才逐漸浮現和凝聚。另外，本文在探析移工媽媽母職內部的異質性之餘，也進一步突破「好媽媽」的討論框

架，指出移工媽媽個人生活中不合於母職期待的部分，乃至她們如何向母國家庭管理這些資訊。這些管理策略亦牽涉到通訊科技的使用，與本文談論跨國母職主軸緊密扣連。

參、跨國「展演」家庭：以通訊科技為中介的家庭互動

當遷移成為母職實作的一環，跨國狀態便不只是移工母職的前置條件，更貫穿了整套實作軌跡。為了跟子女維持跨國聯繫，科技於焉成為協商母職的籌碼，讓移工媽媽靈活配置、獲取資源（Demirsu, 2022; Madianou, 2012; Nedelcu, 2012; Uy-Tioco, 2007）。而手機不僅是跨國聯繫的橋樑，手機本身的特性、提供的功能也讓互動有別於面對面的情境。因此，除了探問移工親子如何使用手機來交流、如何達到長期維繫感情的目的等，研究者也必須繼續追問，手機的科技物特性及功能會如何讓親子關係出現不同於以往的互動模式？對於移工媽媽的母職實作、身分管理又有何影響？

在手機普及以前，分隔兩地的家人較常透過郵寄信件來傳遞消息，緊急時刻才會選擇撥打公共電話；隨後興起的電子郵件，劃開時間和空間的限制，得以追求彼此緊密相連的親密感（Horst, 2006; Wilding, 2006）。當手機成為可負擔得起的商品，互動主軸又再悄然轉變。訊息、通話和視訊皆可發起即時的交流，讓使用者填補和調配生活的空隙，互動從而變得更細緻和靈活（Demirsu, 2022）。

通訊科技重構了人與人之間的互動形式，Madianou & Miller（2013）進一步指出，各個媒介有其成熟的表達形式。例如語音通話雖無影像，但聽覺能表達文字無法傳遞的情感。訊息則強調簡單且快速地

傳遞資訊，使用者也能在下班時間或離線狀態下，回頭讀取訊息，不受同時在線的網綁。訊息亦可平衡昂貴的國際電話所伴隨的經濟壓力，弭平資源造成的資訊不對等。視訊及搭載鏡頭的交流方式，則被運用於長時間的生活交流及參與，視訊畫面徹底改變了接觸感，且對有年幼子女的家庭來說，影響尤為深遠。社群媒體近來提供的直播功能，讓移工能現身於螢幕前，甚至搭建自己的社會支持網絡。通訊科技的物質性會影響交流的型態，及其所能達到的效果。而今，移工媽媽絕非依賴單一媒介進行交流，而是選擇及整併各種不同的媒體。

除了科技物本身的性質，通訊媒介的使用方式也受到文化和社會制度影響。在客工制度的聘僱安排下，移工不論是在雇主家庭或工廠宿舍，一舉一動都在雇主的監視底下。不對等的權力關係也影響移工可使用科技的時間與方式，例如部分雇主不允許移工在工作時間使用手機，認為手機會導致分心、偷懶。藍佩嘉（2008）認為移工使用手機的方式，實則反映了他們在臺灣的邊緣處境，雇主限制移工的手機使用，以增加勞動控制。移工則發展出因應策略，掙脫空間的限制，例如使用訊息，保持不同步卻能溝通的狀態，又或是趁雇主出門、深夜時才使用手機（藍佩嘉，2008）。可見移工的科技實作，不只呈現跨國親子連結，也映照出資源差異和關係中的不平等。本文延續 Madianou & Miller（2013）所強調的「多媒體」（polymedia）概念，討論移工如何在多種通訊媒介之間做選擇——不僅是基於科技物質本身，更是根據工作性質、社會文化脈絡和關係性質來進行調整。

另外，科技讓在場（presence）和不在場（absence）的界線變得模糊，學者們也提出「共同在場」（co-presence），表示跨國家庭已能將自身存在投射回家庭之中，達到共同經歷生活的效果（Baldassar, 2007, 2008; Baldassar et al., 2016; Diminescu, 2008; Licoppe, 2004; Madianou &

Miller, 2013)。Nedelcu & Wyss (2016) 也延續共在的概念，並疊加多媒體 (polymedia) 的使用邏輯，深化虛擬和想像的特性，凝聚為三種不同的日常性共在 (ordinary co-presence) 實作方式。移工親子排出固定的交流時間，其意義更在於特地空出時間給對方的默契，且用視訊通話來強化一起從事家庭活動的感受，例如遠端共同做菜、一起度過跨年夜倒數等。這也相當於營造出虛擬空間 (virtual space)，即便彼此不開口講話，也能體會到待在彼此身邊的親密感。他們不僅把關切之情轉換成具體而微的實踐，跨國互動間的應對調整也呈現出不同的「展演家庭」(displaying family) 方式。⁴

另外，手機既是讓人得以交流、具有「親密性」(intimacy) 的通訊科技，其儲存資訊的功能也讓使用者能夠將社會關係具象化 (objectification)。手機桌面、相簿的照片、特意留存的聊天訊息等，都一再把關係和回憶變成可見的、可隨時調度的資料 (黃思齊, 2011; Christensen, 2009; Sooryamoorthy et al., 2008)。而今，這些資料不只停留在個別手機裡，也會透過社群媒體的分享功能推播給親友及公眾，代表這些被具象的社會關係也將變成對外展演的一部分。在此，手機雖實現了跨國維繫情感的梦想，但劃破時空隔閡的同時，卻也容易導致資訊被去脈絡化地呈現。正如 Goffman (1959) 對社會互動的提點，互動仰

⁴ 細究「展演家庭」(displaying family) 和「做家庭」(doing family) 的差別，前者不僅是展示出來的語言和動作，也可指虛擬網絡上展示出來的視覺現象，後者則是鑲嵌在日常生活裡，更傾向於「視之理所當然」的行動。同樣的行動可能是「做」(doing)，但在不同情境下卻有「展演」(displaying) 的意涵，例如閱讀床邊故事可能只是家庭的日常環節，但對旅居海外的母親來說，能夠唸床邊故事給小孩聽，卻是維持情感的必要行動，象徵她的心仍記掛著家庭，有意展現自己「為人母」的一面 (Finch, 2007; Waruwu, 2021)。本文使用「展演」一詞，不僅有移工媽媽自然而然對子女表露關懷的層面，也涵蓋媽媽們在社群媒體之前臺表演時，為了符合母職期待所展演的行為或策略。

賴行動者對於情境的界定和預期，在不斷的操演和熟習之後，雙方通常會依照既定社會秩序及設下的社會場景而做出對應的反應。然則，通訊科技一旦把雙方的時空硬生生打斷、重新接在一起，互動上的不連貫必得讓彼此付出更多心力來管理所欲揭露的資訊，且此資訊必須同時符合角色劇本和滿足對方預期，以免讓前臺的表演破局。

對十年前的移工親子來說，身分管理大多只是在通話時選擇性透露生活資訊，時空隔閡讓雙方都能隱瞞不願讓對方知曉的資訊。不過，黃思齊（2011）在其親密關係的研究中就提到，當關係中的雙方開始穿梭於社群媒體，透過發文、發照片、轉發貼文作為分享生活的方式，前後臺管理勢必得更細緻、顧及更多面向。同樣的狀況也發生在跨國親子相處之間，甚者，身分管理不再只限於雙方都在線上。由於社群媒體允許特定資訊留存在平臺，行動者需顧及相關資訊在不同時空脈絡下的影響。新興的社群媒體顯然是一道雙面刃，一方面可以透過子女的貼文動態來監看生活、達到管教目的，甚至是跟母國照顧者協作教養（梁莉芳，2024）；另一方面，移工媽媽所發布的資訊，也同時被子女檢視，若是分享休假日的資訊，不免會被子女或親友質疑是拋夫棄子地出國享樂，進而危及移工的跨國母職實作。

藉此，本文論證分為兩部分：其一，探問跨國母職如何用多媒體創造「共同在場」的家庭情境，兩種共在邏輯可凸顯職業類別和親子感情基礎對母職實作的重要性，並描述移工媽媽在遭遇子女反抗的關係衝突時，會如何滾動式調整交流策略。其二，移工媽媽在新興社群媒體加入的前後，如何持續協商前後臺界線、修飾身分，甚至透過隱瞞或揭露特定資訊的方式，把社群媒體變成展演母職的新前臺，以自身日常實作來挑戰母職的樣貌。

肆、研究方法

本文追索移工媽媽們細膩且多重的實作策略，乃至釐清行為背後的差異與限制。母職的概念隱微而動盪，若僅以訪談的方式進行，在此議題上不僅受限於語言隔閡，也可能讓實作成為單一的模板，忽略內部複雜的異質性及動態軌跡。因此，為了探查移工與母國的實際交流狀況，了解跨國母職如何形塑及體現，本文先以民族誌的方式蒐集材料，近距離觀察科技為媒介的互動現場，再輔以深入訪談，確認及增補田野材料。

以田野工作開啟研究，⁵ 研究者盡可能結識來自各處的移工媽媽，培養長時間的互動關係，縮小因國籍、身分不同而造成的距離。田野工作所能接觸到移工親子的相處狀況，有助研究者橋接母職想像和實作，並帶入時間的軸面來彰顯貫時性的變化，呈現出本文所強調之動態調整過程。田野經歷也讓研究者對移工媽媽的日常有基本的了解，把繁複的互動收攏聚焦，成為後續設計訪談問題的主軸，更深刻地捕捉遷移狀態對母職的影響。由此，本文以通訊科技的使用作為切入點，爬梳跨國家庭的遠距運作模式，也在觀察過程中，特別留意移工媽媽們使用科技的情境，以及蘊藏之意義與目的，讓科技使用能扎根於交錯疊覆的特定脈絡，避免將不同的交流形式化約為僵固的母職圖像。

然而，本研究以民族誌進行的主要挑戰在於，研究者是否真能觀察到移工與母國子女的私領域互動。為使田野觀察的深度和廣度足以觸及

⁵ 進入田野之初，便已揭露研究者身分和研究主題。

母職實作，研究者自 2021 年起，⁶ 固定探訪臺北一個以移工為服務對象的組織，⁷ 至今三年有餘。在初探時期，研究者在組織裡協助處理行政事務及中英文教學，也常跟移工一同逛街、採買和煮菜。移工們逐漸熟識，也主動邀請研究者參加組織外的私人聚會。同時，田野範圍逐漸擴展到組織下轄的安置中心，安置中心的交流和過夜經驗迥異於假日的組織，當移工們生活歸於平靜，則經常是各據一方地獨自滑手機、看影片或休息。研究者得以擺脫侷限於特定時段的觀察，觸及到日常生活紋理，了解她們平時跟子女的交流型態。除了組織內的互動，不少移工媽媽會引介彼此的朋友，更時不時讓研究者參與與母國親友的視訊活動。此外，研究者也與移工媽媽成為社群媒體上的朋友，觀察她們日常的發文直播，以及留言區的回覆。在田野中，移工媽媽聊著自己對於「好媽媽」的想像，舉出曾經發生的例子佐證，領著研究者走入她們的生活世界，使本研究分析能夠和她們的看法相互驗證。本研究跟移工媽媽們的交流起始於組織，卻不受到組織範圍的限制，而能透過這些旁觀或加入交流的機會，探入她們跟母國的連結。

本研究主要使用中文與英文進行，研究者亦具備日常印尼文溝通能力。在田野調查與訪談過程中，研究者會根據移工媽媽的語言能力靈活調整訪談語言。例如，對於中文較為流利的移工媽媽，訪談主要以中文進行，輔以英文或印尼文，以確保受訪者能夠清楚表達自身經驗與情感。對於以英文或印尼文較為自在的移工媽媽，則鼓勵她們使用最熟悉

⁶ 2022 年中適逢疫情升溫，該組織採取遠距工作，移工也大多待在宿舍或雇主家中，因此未能實際探訪，只得透過社群軟體和移工維持聯繫，待疫情趨緩後才重啟田野工作。

⁷ 該組織依不同國籍，專設處理印尼移工和菲律賓移工的辦公室，研究者也穿梭於兩邊的辦公室，參與不同國籍的聚會，使觀察對象兼納職業及國籍的異質性。

的語言，以降低語言障礙對敘述的影響。當遇到研究者不熟悉的詞彙或特定表達時，也會請受訪者進一步解釋，以確保理解的準確性。此外，在安置中心觀察移工與子女通話的過程，仰賴多層次的理解方式，包括辨識特定語調、表情與肢體語言，並記錄對話中重複出現的詞語與情緒變化。研究者在通話結束後，會請移工媽媽補充背景資訊與情緒層面的理解，以減少語言與文化上的隔閡，確保分析能夠貼近移工媽媽的真實經驗。

在為時一年的觀察後，研究者向移工媽媽提出正式訪談邀請，訪談對象共十位，包括六位菲律賓籍、四位印尼籍移工，⁸ 年齡介於 26 到 43 歲之間；以訪談當下的就業狀況而言，共有兩位廠工、三位家庭看護工，其餘五位看護工仍在安置中心等待工作機會。訪談時長從一到五個小時不等，地點在組織辦公室、安置中心，其中幾位受訪者則約在各自租屋處或臺北車站進行訪談。訪談前皆先詢問錄音意願，針對錄音內容進行謄打，其中二位移工對錄音感到緊張，研究者改用手寫重點的方式，再於訪談結束後立刻補足重點和細節，盡可能還原訪談內容。

為保護研究對象之隱私，本文所提及的移工媽媽皆以化名處理，也在不影響分析與理解的狀況下，代換部分人物特徵和時間，以避免研究對象被指認的風險。表 1 整理了本文分析中所引用到的研究對象基本資料，包括訪談對象以及田野中深度接觸的移工媽媽；其餘於田野熟識之移工媽媽雖未逐一列出，但亦深刻影響了本文對研究現象的理解與分析。本文兼納不同性質之資料（田野觀察和訪談資料）來呈現立體樣貌，也盡力避免只從單一角度論定移工經驗，試著深化這段綿密又深遠

⁸ 研究者雖然有意探訪每一位曾深入觀察、記錄且聊過親子話題的移工媽媽，但有數名移工已轉出安置中心，或轉換到其他縣市工作，雖然能從社群軟體上取得聯繫，卻很難敲定訪談時間。

的跨國互動過程。

表 1：研究對象資料

受訪者化名	國籍	工作類別	來台年資	子女人數
妮雅	印尼	看護工	5 年	2
蒂妮	印尼	看護工	10 年	2
阿玲	印尼	看護工	9 年	1
阿莉	印尼	看護工	7 年	1
羅德琳	菲律賓	看護工	4 年	1
珮莉	菲律賓	看護工	9 年	3
娜妮塔	菲律賓	看護工	11 年	3
葛蕾丁	菲律賓	看護工	8 年	4
艾希	菲律賓	看護工	8 年	1
潔雅	菲律賓	廠工	6 年	3
珍娜	菲律賓	廠工	10 年	7
喬伊	菲律賓	廠工	3 年	3
蓮娜	菲律賓	廠工	11 年	2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伍、製造共同在場：日常相處的兩種模式

即便移工媽媽有能力將工作所得轉換成子女教育資源，肉身缺場造成的情緒缺口仍不斷挑戰母職實作。她們以物質資源來參與子女的生活，子女卻不必然能感受到這份心意（梁莉芳，2024）。本文認為，這正反映出跨國母職實作脈絡的特殊之處：移工媽媽跟子女的相處有所斷裂，甚至有不少人是在生下孩子後不久便遠赴海外。於此，如何在沒有扎實感情基礎的狀況下實作母職？如何透過通訊科技跟孩子培養默契，遭遇爭吵或不信任等狀況時又該如何調整？甚者，聘僱關係與工作狀況

如何影響母職實作與科技使用？移工媽媽如何將科技鑲嵌進日常工作，並協商母親和受僱者角色？以上皆是研究者必須進一步追問的重點。

本文認為移工媽媽的母職實作核心為「製造共同在場」，亦即經由通訊科技協助，將存在感投射回母國家庭中，鬆綁地理距離對親子情感的影響。然而，通訊科技誠然重組了跨國脈絡下的時間性，研究也發現移工親子會發展出不同的情感關係（梁莉芳，2024），可見單是「共同在場」，無法涵蓋跨國交流的異質性。

為此，本文以理念型（ideal type）的方式區分出兩種共在模式，此分類並非對經驗現象的僵硬二分，而意在提供一套分析框架，以理解移工媽媽如何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選擇不同的母職策略。共在概念的發展，一方面呼應 Hondagneu-Sotelo & Avila（1997）、Parreñas（2005）等研究者早期對跨國母職策略的討論，另一方面也和晚近興起的數位親職進行對話，揭示科技在母職實作的作用。不同的媒介各有特定的溝通特質。例如，文字訊息適用於短暫而緊急的對話，而視訊及直播則適合較長時間、更深入且具情感意義的互動（Madianou & Miller, 2013; Nedelcu & Wyss, 2016）。因此，研究者不應將通訊科技視為同質化的工具，而應關注不同媒介如何與母職實作交互作用。

在此基礎上，本文區分出「掌握性的共在」與「陪伴性的共在」兩種互動模式。兩種模式對應特定的科技媒介，而不同媒介的溝通特質，亦影響母親欲傳達的交流效果。藉此，我們得以理解移工媽媽如何賦予科技交流意義，又如何混用不同媒介，以達成特定的親職目標。更為重要的是，移工母職實作的選擇往往受限於時間與資源的匱乏。為了提升交流的有效性，她們不得不在不同實作策略之間進行取捨——孩子此刻最需要的是情感支持，還是具體的決策建議？本文發現，影響移工媽媽決定母職實作內容的關鍵因素，在於子女的年齡與母親在出國前的陪伴

經驗。前者影響母親對子女當前需求的判斷，後者則決定母親如何評估交流的強度，以及親子關係應如何被調整與補償。另外，聘僱關係也扮演重要角色，身在臺灣的移工媽媽，必須把通訊科技的使用，融貫進日常工作，以平衡受僱勞工和跨國母親的多重角色。聘僱狀況因此很大程度地形塑了科技使用和選擇，但同時，科技的物質性也協助移工跳脫當下的時空限制。

最後，本文運用理念型來進行概念發展的分析策略，借鑑了藍佩嘉（2014, 2019）區分台灣家庭四種典型教養風格的方式。理念型的區分並不代表移工媽媽使用科技的方式可以被明確歸類為任一種模式。相反地，移工媽媽因應工作狀況混合使用不同的交流方式，並隨著子女年齡及親子關係的變化進行調整。區分出「共在」的理念型並非目標，而是一種分析策略（Weber, 1904／張旺山譯，2013），幫助我們揭示母職與科技交互作用下的多媒體實踐。

一、「掌握性的共在」：關心生活軌跡，影響日常抉擇

本節談及的移工媽媽主要是在子女就學後才遠赴海外，未出國前是子女的主要照顧者，曾陪伴孩子走過童年時光，已有一定的情感基礎。雖然離別之際難分難捨，但出國工作大多是跟孩子達成共識的決定。由於子女們多半正值青少年時期，這些移工媽媽最擔憂的莫過於孩子會走上歪路，所以既想把握成長時光，也得將其引導至正確道路。為此，她們仰賴訊息和通話的幫助，來了解家中發生的大小事，小至手足間的相處摩擦，大至申請學校或工作，嘗試引導子女做出正確的選擇，並在過程中參與家庭日常。透過零散的问候和交流，移工媽媽掌握母國家庭動態，深化「共在」的連結意義，本研究稱之為「掌握性的共在」。

由於無法親眼確認狀況，訊息是移工媽媽得知子女生活細節的基礎。訊息的優勢在於非同步溝通的特性，不僅能對抗地理限制，也具備靈活安排時間的彈性，彼此不必特別把時間排開，可用零碎的時間進行回覆；移工媽媽可在事情發生的當下就傳訊息分享，子女也能時時刻刻報備活動和行蹤。透過來回的詢問和確認，她們既對子女的狀況有所掌握，也同時協調行程，敲定可以通話的空檔，若臨時有變動，則即時傳訊息告知對方，避免發現錯過或空等的狀況。菲律賓籍移工娜妮塔表示，她會時不時傳訊息檢查三個子女的行蹤，並從明確的時間表了解每日的安排：

你知道我女兒……唉，你之前也看到我們視訊吧，他現在有自己的朋友，有時候出去玩都沒有跟我講，因為我是一個媽媽，我就會覺得很擔心……我後來就跟她要時間表（schedule），我看到就知道今天要幹嘛，會問她說：「喔你現在在哪裡？」、「你現在是不是回家了？」她就會告訴我，這樣比較好。（菲律賓移工，娜妮塔）⁹

非同步溝通雖然能縫合交流的時間差，卻也造成細瑣的挑戰。訊息提供事後回覆的彈性，反倒讓移工媽媽不再能直接或強制要求子女定時給予回覆，只能被動等待「空閒之餘」回傳的訊息。她們也擔心子女不是沒時間回訊息，而是刻意不回訊息，更害怕這種「有空再回」的模式會讓彼此漸行漸遠。

為了避免真相被刻意或「善意謊言」掩蓋，移工媽媽積極採取行動

⁹ 所有菲律賓籍移工和其中一名印尼籍移工的田野互動及訪談都以英文為主，部分印尼籍移工會在對話中穿插使用印尼文，引用時皆由本文作者翻譯成中文。

來獲取多方資訊，例如跟家中的其他照顧者協作。Chib et al. (2013) 對印尼和菲律賓女性移工的研究，發現移工媽媽會經由母國照顧者之手，遠端控制、制定和討論育兒方式。對葛蕾丁來說，菲律賓的親友就像是「第三隻眼」，一旦子女沒回訊息，便轉而詢問其他照顧者，協助確定子女的動向，以及他們是否隱瞞、說謊：

有幾次他們說已經到家了，我叫他們開視訊，他們說「等一下」，我就感覺事情怪怪的。我打電話去給住在附近的親戚，請他們到我家確認，如果發現（小孩）不在，我會再打回去問他們為什麼騙我。（菲律賓移工，葛蕾丁）

照顧者的協力網絡是跨國母職的頂樑柱之一，移工媽媽需要仰賴其他照顧者的分工、後勤支援或暫時接手照顧，甚至是讓渡出部分權力，留給照顧者應對變通的空間。娜妮塔表示，她會在多方確認下拼湊全貌，乃至委由母國照顧者來傳達價值觀：

我都會知道啊，就算他沒跟我講，其他人也會跟我說他不乖……我也都拜託我的姊姊，跟他說要多多照顧我的小孩，因為我不在，要有人看他們，拜託她（姊姊）跟小孩說我是因為要賺錢才不在家，然後他們（小孩）就會知道這些道理了。（菲律賓移工，娜妮塔）

為了得知子女的生活全貌，除了傳訊息或跟照顧者協作，移工媽媽也搭配通話功能。最重要的通話常出現在夜晚時刻，並以這通電話為軸，串接一整天的交流。對於在工廠工作的移工媽媽而言，上班時間無法任意使用手機，她們把握固定的空檔傳訊息，例如喬伊在打卡上班

前、如廁時、午餐休息等零碎時間，都會查看訊息和回覆子女。晚間下班後，才能有比較自在與連貫的時間能與子女通話。即便這些資訊早已用訊息確認過，移工媽媽還是不厭其煩地想從子女口中聽出更多細節。當詢問蓮娜通訊科技是否有傳達情感的侷限，又會否影響她們判斷子女的狀況時，她表示：

有時候真的很難，傳訊息的時候寫得很少，你知道這件事發生了，但你不知道到底是怎樣……可能會再傳一次訊息問，問他是不是不高興、還好嗎、覺得怎樣，但這些東西（傳訊息）問了可能是一樣，他們講不多。但視訊的時候你就知道他們在不高興，用問的不一定要講，但你會（從視訊畫面）看出來……所以你看我們才總是要講電話、每天講，因為那是不一樣的。（菲律賓移工，蓮娜）

對移工媽媽來說，若想掌握子女的生活，需要搭配訊息和通話的長處來串接事件全貌。尤為重要的是，移工媽媽在了解事件之餘，還會帶入自身教養觀念，給出進一步的建議，告訴孩子什麼該做、什麼不該做，又應該要怎麼做。來自菲律賓、輾轉在各國工作多年，目前已是祖母的看護工艾希表示，因為自己需要照顧阿嬤，兒子也得出門工作，雙方較難維持通話一小時以上，通常會在阿嬤入睡且兒子下班後才開始通話。年近五十半的艾希用起社群媒體仍是得心應手，甚至會用臉書的上線狀態來判斷兒子是否也已下班，一旦狀態跳成「上線中」，她便撥打電話，連接上兒子在菲律賓的家庭生活。她會跟兒子交流當天發生的事，也自嘲自己「很囉唆」，即便兒子已經成家立業，還是忍不住會耳提面命地告誡一些事；

他跟我說今天怎樣怎樣、發生什麼事、哪個同事怎麼了，害他很累，我也會跟他提醒一些事。像是什麼事？就是要小心、不要喝酒、不要跟朋友到處跑、要幫自己的小孩多賺點錢、要當個好爸爸……大概像是這些，我都跟他講這個，他會說，好好好，他知道了。（菲律賓移工，艾希）

艾希把囉唆界定為給兒子的建議，同樣地，前述的娜妮塔和蓮娜聊到晚間通話的內容時，也多次提到這個關鍵詞，促使研究者繼續挖掘「建議」所代表的意義——晚間通話究竟佔據什麼樣的母職實作定位？又如何跟「建議」交纏在一起？

在田野的閒聊中，娜妮塔常將話題引向母親的責任、重申自己的貢獻。她認為媽媽最重要的身分不只是賺錢，而是要適時導正脫序的行為，成為子女成長道路的燈塔。換言之，經濟上的協助只是錦上添花，引導孩子走往正確的方向才最為重要。當問起平常是如何將這樣的想法付諸行動，娜妮塔描述了青春期孩子的叛逆，表示自己一面作為子女詢問意見的對象，一面也主動提供方向：

……媽媽就是給建議，我就在這裡，雖然不是說在他們身邊，但他們來問我，我就會回；如果看到他們做得不對，我也會告訴他們應該怎麼做，不然小孩會變得不乖、跟別人學壞。要讓小孩知道什麼是對的、要怎麼做，這不是給錢就好了，給錢的話會亂花，但教他們、讓他們了解道理，這些以後長大都用得到。（菲律賓移工，娜妮塔）

其他移工媽媽也分享了關於「建議」的看法。蓮娜認為媽媽應該扮演引導和給予建議的角色，得知子女日常行程之外，也能給予相應的建

議。

給建議時候我會覺得很安心，他們遵從我的指引，我也會問他們後來發生什麼事，他們都說很好。這讓我知道我的建議對他們來說很 ok，我又知道他們發生什麼事，對，而且我又告訴他們要怎麼做，等於我都知道，還知道之後會發生什麼。這就是為什麼我覺得我不那麼想要回家了，因為現在，你透過手機就可以跟他們講話、叫他們做你希望他們做的事。（菲律賓移工，蓮娜）

言下之意，讓蓮娜感到踏實之處，在於她能跟上子女生活的日常，甚至有機會下指導棋，引導未來走向。這也是「掌握性的共在」的一塊重要拼圖，平日裡的一連串查勤、詢問和建議，意在從「關心和建議子女」，銜接到「掌握日常生活」，從被動得知轉為主動出擊，雖然是用零碎的訊息和通話接起互動，卻好似親自參與事情經過，讓子女覺得媽媽好像一直守在身邊。

不過，看似綿密的訊息和通話交流，也有疏漏之處，移工媽媽需要滾動式調整策略。蓮娜看重子女未來的發展，反覆告誡女兒應該先完成學業後，再考慮交往與結婚之事。每當聊起親密關係的話題，蓮娜都強調女兒「很聽話」，從未違反這項約束。然而，蓮娜開始注意到女兒的臉書動態上，偶爾會出現一位她不認識的男性，並且常和女兒有密切的留言互動。直到某天看見女兒上傳一束玫瑰花的照片，積攢已久的疑惑才一次迸發。幾經詢問，女兒坦承和對方已交往三個月，蓮娜在震驚、生氣、訓斥跟逐步溝通後，也意識到母女間雖然每日都有固定交流，仍會有被刻意按下未提的資訊，當即開始思索是否應該加強對女兒生活的了解。經歷這樣溢出教養腳本的意外後，蓮娜和女兒重新培養交流默

契，從原先的語音通話，轉為盡可能開啟鏡頭，以便確定女兒身邊有什麼人、是否安全抵達學校宿舍。若發現女兒與對方待在一起，蓮娜會要求對方也加入視訊，不厭其煩地叮囑對方要保護女兒的安全、不可影響女兒課業。此次插曲可看見移工媽媽靈活調整交流策略的能力，也映照出社群媒體上資訊管理的重要性。社群媒體使用者需要同時維持家人、朋友等多重前臺，讓各種關係及秩序不至於崩解；當某一方揭露的資訊若與彼此的認知或期待有所斷裂，便會生出嫌隙，讓雙方再次意識到彼此終究不是真正生活在一起。

喬伊、蓮娜和其他採取掌握性共在的移工媽媽皆是工廠工人。她們的通訊時間在工廠生產體制的規範下，高度受制於排班結構與勞動節奏。在工作期間，他們必須維持工作專注和生產量，無法自主調配手機使用權。這讓她們只能運用上工前後的零碎時間來傳訊息，期待著子女的非同步訊息更新。另外，也有少部分家庭看護工，白天忙於照顧長者，或被雇主嚴格限制手機的使用時間。例如艾希照顧的阿嬤被診斷出阿茲海默症，她需要時時盯著阿嬤的一舉一動，不能讓阿嬤落單。艾希無法一直維持在線狀態，只能等阿嬤入睡後，才能放心跟兒子通話。

在本節分析中，移工媽媽掌握生活瑣事，再延展出帶有實際教養意涵的建議，而順著這套實作邏輯，掌握生活跟給予建議是一體兩面的著力點。移工媽媽先用訊息和通話交流資訊，掌握大致狀況再給予建議，也是在給予建議之後，才能使子女的生活軌跡更在掌握之中。因此，她們能從零碎的訊息、簡短的通話來描畫彼此的生活，再用關心和建議來將欲傳達的教養準則穿插其間，成為連貫而深刻的日常家庭互動。總結來說，這套自建議到掌握的多重科技使用策略中，訊息和通話各有長處、各司其職，讓移工媽媽間接對家庭生活進行管理，並感受到自己正對子女造成影響、參與大小事件的抉擇，匯流為共同經歷生活難關的

「掌握性的共在」。然則，百密總有一疏，社群媒體提高了互動的不確定性，親子的情感基礎亦會影響跨國母職的成敗。若是如蓮娜母女般關係緊密，插曲可在重新調整交流方式後化解；若是親子關係並不穩固，一旦危機出現，縱然動用各種交流方式也難以填補漏洞。於此，虛擬的共同在場無法全然取代實際陪伴，出國前的親子關係是跨國母職在實作上的重要因素。

二、「陪伴性的共在」：保持通話狀態，彌補親子時光

社群媒體讓訊息、通話或視訊皆免去付費門檻，飽受思念之苦的移工媽媽們得以進行更頻繁、更長時間的交流。視訊及直播結合聽覺和視覺，螢幕兩端的家人幾乎像是面對面互動，創造出「同在一起」的交流情境，也影響了跨國「展演」家庭的策略（Nedelcu & Wyss, 2016）。本節所欲探討的移工媽媽，通話模式及內容不同於「掌握」的邏輯，而是以視訊來強調守在身旁、即時回應的親子時光，本研究稱之為「陪伴性的共在」。

進入田野一段時間後，研究者注意到一種不顯眼，卻潛伏於日常的通話方式：移工和母國子女雖然接通電話、打開鏡頭，卻不會滔滔不絕地分享生活，反而在保持通話狀態的同時，照舊進行手邊的事。由於她們經常只戴著單邊的耳機，隨意將手機立在桌前或放在大腿上，又照常參與移工間的閒聊，所以在一開始，甚至難以發現通話正在進行，直到移工媽媽突然跳開聊天話題，開口對螢幕另一端的子女說話，才令人驚覺對方一直都在線上。

研究者開始留意移工媽媽是否戴著耳機、用眼角餘光確認螢幕畫面，發現這樣的通話方式在田野裡實不少見，並激發出進一步提問：這

種「通話卻不對話」的模式，對她們而言代表著什麼樣的意義？若非直接開口對談，又該如何維持情感？研究者在她們正式掛斷電話之後，追問背後的邏輯和意義，得到的回答可分為兩個層次，其一，以密集對話為核心的通話，不免夾帶被迫回覆的壓力，若轉為不必開口或可隨意開口的默契，可更有彈性地應對其中一方無法開口的情況；其二，通話搭接的管道一旦保持即時暢通，便能讓她們感受到一種開口就能觸及對方、彷彿對坐在餐桌兩側的感覺，搭建起日常相處的踏實感。

不同於「掌握」是以頻繁的訊息和簡短對話來了解子女動向、給意見或傳遞價值觀，本節談及的視訊通話時間長至半小時以上，或直到其中一方不得不掛掉電話。印尼籍看護工蒂妮習慣在被照顧者午休時，跟兒子們視訊，一邊吃飯一邊確定兒子們放學後安全到家。¹⁰剛到臺灣時，蒂妮的小兒子尚在襁褓中、大兒子還不太會講話，加上通訊技術未及現在發達，彼時只能靠著家人側錄的影片來了解家裡狀況。直至今

¹⁰ 為了維持長時間的視訊，移工必須從薪水中預留一部分作為手機通訊費用。蒂妮表示，印尼的網路費用遠高於台灣。在台灣，每月支付 500 至 600 元台幣即可享有吃到飽的網路，但在印尼老家，她必須定期購買網卡，平均兩個月就得花費約 5000 元。隨著兩個孩子漸漸長大，手機遊戲的網路流量消耗也大幅增加，孩子們在視訊時經常要求媽媽支付額外費用購買更多流量。然而，即便投入高額費用，蒂妮的家人仍受限於不穩定的網路。遇上雷雨，視訊畫面便斷斷續續，颱風來襲時，甚至可能暫時失去與家人的聯繫，使得遠距母職的實踐充滿變數與挑戰。Massey (1994) 以權力幾何學 (Power geometry) 的概念來討論個人和群體會因權力和資源的落差，而體會到不同的壓縮效果。科技並非均質地賦權於所有人，時空壓縮的效果取決於個體的社會經濟條件與科技基礎建設的可及性。對移工而言，通訊科技的使用不僅受限於個人經濟能力是否能負擔手機與流量費用，更受到其母國所在地的網路基礎設施影響，進而決定其跨國交流的可能性與穩定性。出身於中爪哇小村莊的蒂妮，受到這個她難憑一己之力扭轉的結構所困；同樣的，部分住在菲律賓鄉村的移工媽媽也反映過她們也面臨著類似的科技不平等问题。

日，兒子們雖然已升上小學、具備一定語言能力，卻很難要求愛玩的他們規規矩矩坐在螢幕前面，故而蒂妮選擇退讓一步，大部分時間都讓兒子架好視訊後，在螢幕內外衝來撞去、各玩各的遊戲，偶爾才穿插著問一兩個問題，或在兄弟倆拌嘴時出聲制止，其餘都是靜靜地伴在螢幕另一頭。過去的側錄影片形式把家庭互動濃縮到手機畫面裡，但視訊的優勢在於，蒂妮可「即時」觀看並給予回應，甚至感覺自己真的坐在家裡客廳，親眼看著兒子們嬉笑打鬧，並同時讓兒子們知道媽媽正在螢幕的另一端：

用講電話，聽到比較好，如果用寫（訊息）這樣的，我也不知道他在幹嘛，如果我問你在幹嘛，他說現在在吃飯，但是如果沒有呢？那用視訊就能看到啊！那視訊會一直看著鏡頭嗎？不一定，會做自己的事，看他們啦，一定我（看著他們），他們不會（看我）。如果講電話，弟弟說哥哥在看電視，我就放著看他們看電視，要去上廁所什麼也都可以啊，我都看到他們在幹嘛。（印尼移工，蒂妮）

雖有通話機會，但移工媽媽擔心情感無法完整透過言語傳遞，年幼孩子們也還沒有成熟的溝通能力，所以轉而強調存在感，藉由通話搭起的即時在線，把自身的存在投射入母國家庭中。據此，實作的焦點並非子女分享了哪件事、分享得多深入和仔細，而是讓通話保持接通、可以隨時開口對話的狀況，使彼此感受到「對方就在身邊」。移工媽媽將「通話狀態」轉化成「在場」，以期跨越地理距離上的鴻溝，達到一種待在對方身邊、疑似陪伴的效果。

來臺多年都未曾回印尼探親的阿玲，想起母國家人不免有些悵然若失，但更讓她摸著心口糾結的是，兒子一度跟她漸行漸遠，只把照顧自

己的奶奶和阿姨當成親密家人。同樣在兒子不會講話前就出國的阿莉也表示，因為自小就不在身邊，孩子跟她的關係十分疏離，甚至不願意喊她一聲媽媽，認定多年陪伴照顧的阿姨才是「真的」媽媽。雖然她們不厭其煩地向兒子解釋離家原因，嘗試縫補這段關係，但兒子不太願意開口對話，常常迴避問題或有所隱瞞，讓對話陷入毫無進展的鬼打牆。在痛苦、愧疚和糾結之下，阿玲和阿莉慢慢摸索出陪伴的重要性，意識到讓兒子感覺到「媽媽陪在身邊」，才是真切扎實的行動。她們各自轉變方式，就如阿莉培養出早餐視訊的默契：

我後來都是吃早餐的時候跟他打電話，他爸爸叫他起床，吃早餐換衣服，再去上課，我們是沒有一定要講話，我看他也不想……但他會知道我在，前面會講一下，就說早安，我是想要陪他吃早餐、看他吃早餐。

那小孩有在注意你嗎？

沒有啊，他就做他自己的事，他在他的手機上看影片，我們打電話是用他爸爸的手機，啊他腦袋都是在手機（影片）上，只有我突然講話或講話變比較大聲的時候才會轉來看我，我也只有一些時候會問他說吃飯怎麼樣、學校怎麼樣……因為我也是被叫去要照顧阿嬤，手機有時候放口袋或放旁邊。（印尼移工，阿莉）

雖然不涉及資訊分享，但阿莉運用平凡且固定的用餐時光來搭建互動情境，試圖削弱距離的存在與螢幕的隔閡，讓跨國交流變得更加自然，也更像是實際待在同一個空間，好似抬頭就能進行對話。菲律賓籍的潔雅同樣化用了這種空間感，她會跟三個孩子說「Give me the CCTV」，也就是讓孩子們開啟鏡頭、把手機立在餐桌前，好似一家人

圍著餐桌吃飯的親子時光：

我讓她們把手機靠著立起來（比出動作），然後繼續吃飯，我也看他們吃飯，看他們笑著聊天就讓我很開心，其實（手機）放很遠，我也聽不到他們在講什麼，但是只看他們笑，我就會笑，像在家一樣……如果說是接了電話就把手機放在那邊，你完全不管他，那我覺得這很莫名其妙，但我們不是這樣，我會看一下，所以知道他們在幹嘛。我就陪在那邊、跟他們在一起，你知道吧，這就是這樣做的意義！（菲律賓移工，潔雅）

雖不能親自在場，但潔雅用視訊中介出虛擬的存在，將通話狀態視為是「餐桌時光」的轉化——甚至更緊密、更珍惜——讓彼此可以聽得到、看得到跟感受得到對方。同樣在此，互動的親密感並非體現於高密度的聯繫，或是深層的談心內容，而是一種能感受到對方就在身邊、開口就能觸及的踏實。

論者可能會假設，家庭看護工需隨時待命，而廠工的工作時間則較固定，因此後者更能跟子女維持穩定的互動。然而，本研究從田野資料和訪談中發現，看護工的跨國交流實則更具彈性。看護工們雖得處理雇主家中的突發狀況，但實際工作內容因被照顧者的身體狀況而有差異。有些移工需要全日注意被照顧者的狀況，也有些人只需負責簡單飲食起居。即便後者的工時較長，卻更有機會在工作時兼顧家庭生活。

本節提到的移工媽媽，如蒂妮、阿玲、阿莉等人亦皆是家庭看護工。除了工作彈性，子女年幼而難以透過文字訊息交流，也是她們積極向雇主爭取視訊時間的重要原因。她們的中文相對流利，能向雇主說明

母國家庭的情況，在保證不影響工作或不讓被照顧者入鏡的前提下，雇主大多會體諒。她們把聯繫時間固定於日常生活的節點，利用早餐或晚餐的時間撥打視訊電話，煮菜或掃地時也會掛在通話上。這讓持續視訊的恆久上線狀態成為可能。其中，也有移工讓被照顧者加入視訊的行列。羅德琳照顧因中風而臥床的阿嬤，阿嬤稱讚她的孩子可愛又有禮貌，表示跟小孩視訊能讓心情輕鬆許多，羅德琳也讓孩子學著用中文打招呼。這樣的安排不僅讓羅德琳的孩子獲得額外的情感支持，也讓她能將照顧長輩與陪伴子女的時間結合，使遠距母職的實踐更具連貫性，而不侷限於夜晚等零碎的閒空時段。

對這些移工媽媽來說，「在場」背後的意義是「陪伴」，以在線的通話狀態製造更直接的「共在」。她們大多在子女生命歷程的初期便遠赴海外，實際相處時間較少，錯過培養感情和信任的重要階段，就算喊得出「媽媽」，孩子們也不必然意識到這個角色的意義和付出。因此，在面對跨國母職的挑戰時，她們無法將既有的感情基礎，轉換成抵禦距離的籌碼，必須一邊交流一邊打地基。更有甚者，她們面對的大多不是能夠專注地坐下來交談、以抽象概念傳遞價值觀的對象，而是牙牙學語、還無法流暢溝通的年幼孩子。在摸索和協商的過程中，移工媽媽意識到密集對話無法在此關係中發揮功效，便觀察孩子的反應、互動習慣，逐步調整通話方式，最終磨合出輕鬆、日常的共在形式，用持續的通話狀態來彌補肉身缺席，即便各做各的事，也可感受媽媽的陪伴。

三、小結：受親子關係和聘僱狀況影響的母職實作

印尼和菲律賓籍移工都受到家務勞動之性別分工的社會文化影響，形塑她們需履行的母職腳本。不過，母職腳本是社會對母親的期待和理

想角色框架，母職實作則是因應實際狀況所行動的結果。在把腳本付諸為實作的過程中，又會再受到親子關係（即子女年齡、過往陪伴經驗）及聘僱狀況的影響，移工媽媽一方面要顧及親子關係來調整教養策略，另一方面也要協商日常工作。針對後者，移工媽媽必須在工作與自身母職實作之間取得平衡，面對雇主的監督和規範，移工有時不得不壓抑自己的母職實作。這顯示出，母職實作並非單向地受文化腳本規範，而是在勞動場域與聘僱權力關係中不斷調整與協商。移工選用科技媒介的結果，亦是他們因應結構性限制所發展出的母職實作策略。

在「掌握性的共在」中，雙方已有穩固的親情基礎，故而把更多心力放在日常行動的「掌握」及建議，引導孩子做出正確的人生抉擇。移工媽媽傾向運用簡短、快速且靈活的媒介，如訊息或短時間通話，來確定子女的動向。在「陪伴性的共在」中，主要目標則是培養熟悉與親密感，由於子女年幼，移工媽媽側重於可傳遞聽覺、視覺等較直接的媒介，如直播或視訊，巧妙地把通話狀態轉化成「在場」，重構空間感來達到陪伴子女的效果。與此同時，子女年齡和過往陪伴經驗相互重合：子女年齡較大者，通常在母國已有一定的親子感情基礎，傾向採用掌握性的共在；子女年齡較小則陪伴經驗較少，而選擇陪伴性的共在。年齡和陪伴經驗作為母職實作差異的重要脈絡，反映了跨國母職中非線性連貫的相處特性，兩種共同在場的理念型正是因應不同的陪伴和情感脈絡，所開展的跨國母職圖像。

除了親子關係的脈絡，聘僱狀態更是影響日常場景中的科技使用。為了限制移工勞動力，臺灣政府將管理移工的責任外包給雇主，這讓移工的工作環境成為充滿監視的場域。與雇主同住的家庭看護工，日常起居的家庭空間佈滿雇主的控制，移工連休息時間也得配合雇主。廠工雖然不與雇主同住，但時間與空間都受到雇主管理，也經常得和多人共享

狹小的宿舍。因應不同勞動條件，移工也調整交流的媒介。

本文歸納出，廠工的工作時長較為規律，但班表可能因工廠需求而有所變動，或者移工積極爭取加班或大夜班等賺取加班費的機會，導致與子女的作息錯開。其中，幾位在工廠工作的移工媽媽，經常值夜班到清晨才回宿舍，輪班也大多是平日休假，一天只能擠出最多半小時到一小時和子女講電話，其餘時間都是透過訊息交流。其他廠工也表示，他們無法像部分看護工一樣，撥出早午晚餐或孩子放學的下午視訊，最多只能在下班後通話。對廠工而言，為了因應勞動狀況，非同步的通訊媒介成為首選，她們可以在短暫的休息或如廁時間查看訊息。另一邊，家庭看護工的工作時間較為靈活，雖然隨時可能受到雇主的勞動監視，但部分看護工仍有機會爭取雇主的體諒。例如阿莉詢問她所照顧的阿嬤是否可以跟孩子視訊，並強調這並不會影響工作、也不會讓被照顧者入鏡；移工能跟子女有較長時間的視訊交流。至於未能爭取到手機使用彈性的移工，則會利用較為零碎且能避開雇主管控的時間（如倒垃圾、被照顧者午休等）使用手機，或在有限的休息時間快速查看訊息。

廠工因工作的限制，大多選擇掌握性的共在。看護工則有較為靈活的時間安排，以及跟雇主協商的空間，若獲得雇主的允許，即能跟孩子維持一定時間以上的視訊，甚至固定在早餐或晚餐時間撥打視訊電話，達到陪伴性的共在。若未能獲得許可，則如同廠工的作法，採用掌握性的共在。在此，科技並非單向地賦權或削弱母職實作，而是與移工的勞動條件、聘僱關係以及家庭互動模式交織，共同塑造了一種具有彈性及適應性的遠距母職。

最後，廠工和看護工的工作性質差異，也受到資本主義的支配勞動力邏輯影響。在不同工作場域的移工，勞動力有不同的體現形式。工廠的空間受到資本家（雇主）和生產線上的管理者所支配，勞動過程有明

確的工作規則，也很大程度受到控制。在排班時間，廠工被要求全神貫注在工作上，任何與生產線無關的行為，都被禁止和監督，下班後才能回歸個人生活。相對而言，與雇主同住的看護工，雖也是雇主外包照護工作的勞動力，但對雇主家庭而言，看護工也是朝夕相處、活生生的個人。家庭雇主更有可能會允許看護工在不影響工作的情況下，兼顧照顧工作和母國家庭。雇主看待移工作為勞動力的方式，在不同工作場域發揮不同效果，也延伸影響移工跨國交流的彈性。而東南亞籍移工媽媽的母職實作，回應了母國性別分工對女性的文化性規範，以及勞動市場對移工的制度性限制。

陸、前後臺身份管理：共在之下的母職劇碼

在通訊科技融入日常工作之外，移工的休假日則提供另一個分析移工母職的角度。在工作日，移工媽媽需在教養者與養家者之間取得平衡；而在休假日，則在母親角色與個人生活之間協調，以避免被質疑為單獨離家享樂。在本研究中，部分移工媽媽在與母國丈夫分居多年後，已在臺灣建立新的親密關係，並藉由休假日的時間享受個人生活。然而，由於性別角色期待，以及父權主導的母國社會結構影響，移工媽媽往往必須有意識地隱藏其在臺生活的某些面向，甚至刻意展演符合理想母親形象的行為。換言之，移工媽媽需要在通訊媒體上進行身分管理。因此，除了注意她們對子女的關心外，研究者也不應忽略那些被刻意按下不提的資訊，才能更全面地理解移工媽媽的多重樣貌。其中，週日不僅是移工逃離雇主管轄的「後臺」（藍佩嘉，2008），本文進一步指出，週日的出遊亦是移工媽媽為了維持母親形象，需要向母國家庭粉飾的另一個後臺。

移工母國的社會文化確實建構出一套理想母職劇碼（repertoire），要求女性重視家庭價值。然而，本文指出，當移工媽媽攬下家庭的經濟責任時，也重構了原有的母職劇碼。她們將海外工作納入母職的實作範圍之中，形塑出兼顧照顧與養家的跨國母職樣貌。因此，我們可以從田野資料中看見，經濟貢獻成為移工媽媽的盾牌，幫助她們抵擋部分來自母國的質疑，並爭取更多屬於個人生活的空間。

本節將聚焦於移工媽媽在休假日的活動，探討她們如何在個人生活與製造共在之間取得平衡；當面對可能被指摘的行為時，移工媽媽如何拿捏資訊揭露的分寸，或是如何向子女進行解釋。同時，她們的做法反映出其所演出的母職劇碼樣貌。這些資訊篩選與身管理理的實作，不僅展現了移工媽媽在跨國狀態下的主體性，更是其重構母職意涵的關鍵之處。本文納入移工在工作日與休假日中等情境，說明通訊科技使用的不同場景，以期讓移工媽媽的形象更為立體，並補足「共在」對她們而言的多重含義。

一、隱藏特定資訊：維持母職前臺的佈景

通訊科技的發展提高了跨國親子製造共在的密度。在過往通訊不便的狀況下，移工媽媽有更多空間來管理身分或隱瞞不欲人知的秘密；如今，前後臺的界線因交流管道的多元化，需要不斷協商和重新界定。幾位研究者接觸過的移工媽媽在臺灣有另一位親密伴侶，每人的狀況各有不同，有些人早已和母國丈夫分居，只是礙於外界眼光和離婚不易而維持法律上的婚姻關係；有些則是維持著兩段平行的關係。移工媽媽雖能在通訊科技搭起的前臺出演關心子女的母親形象，但從她們面對母職的看法，以及平衡婚外親密關係和母親身分時所經歷的內心衝突，仍能看

出跨國母職並非鐵板一塊，存在著理想和實作之間不同程度的落差。有些移工媽媽會為此深責自己是個不完美的媽媽，亦也有人認為維持親密關係和關心母國子女是兩回事，在臺的親密關係並不礙於母職實作。

珮莉數年前剛到臺灣時，個人手機仍不發達，只能跟家人事先約好時間到網咖租借電腦視訊。雖能夠每隔幾週在螢幕上看到家人的身影，珮莉仍覺得孤身在外的苦楚無人能理解。她後來在臺灣遇到另一位知心伴侶，相互聊慰身處異地他鄉、身為移工的辛苦。因為當時的跨國交流較不密集，珮莉只要把話題專注在子女身上，避重就輕地不提自己在臺灣的生活，就能輕巧地隱瞞這段關係。珮莉成功運用時空隔閡，把視訊變成跨國母職展演的前臺，扮演定期關心子女的海外母親，並把婚外關係的秘密留在「共同在場」之外的後臺。不過，即便珮莉不斷強調她每天都為家庭而努力賺錢，且從未停止跟小孩聯絡；另一方面，卻也自我批評是個失格的母親，所作所為形同背叛家庭、背離社會期待。談起這件往事時，珮莉跟對方的關係已結束超過五年之久，並向母國家人坦白一切，卻仍舊背負巨大的愧疚和懊悔。

珍娜和法律關係上的丈夫分居多年，目前跟同在臺灣工作的男友安迪維持多年親密關係，穩定發展超過七年，面對臺灣朋友時亦已稱呼安迪為丈夫。從七年前的通訊不便一路走到網路發達的現在，珍娜管理資訊的方式明顯有策略和程度上的改變。珍娜起初的作法和珮莉相似，只要在為數不多的通話時間對此事避而不談，便能成功不被子女發現；然而，當資訊交流變得密集和多元，珍娜必須撥出更多時間和七名子女視訊交流，也得更注意日常生活的小細節，以免不小心露出馬腳。平時若接到子女的來電，珍娜會請安迪先行迴避，或是事後再回撥給孩子。此外，珍娜始終不在社群媒體上發布任何跟安迪有關的資訊，在朋友的貼文留言區下也會避免有所交集，兩人在社群媒體上近乎隱身。這樣的作

法初期有效，時間一長，年紀較長的女兒們仍注意到珍娜視訊的背景並非宿舍或雇主家，便開始追問她跟誰出去、身旁有誰，讓珍娜不得不將實情告知兩位大女兒。與珮莉不同，珍娜並不認為交男朋友會影響母職或在臺工作，她掛念子女的心始終不變，強調每天認真工作賺錢、只在休假日跟男友見面，但她依然擔心年紀較小的孩子們會不諒解自己的作法，甚至指責她拋家棄子。因此，面對資訊管理的部分失敗，珍娜要求兩個女兒持續向弟弟妹妹們保密，並將女兒拉入自己的陣線，要求她們代為轉達自己對其餘子女的關心。

除了在子女面前隱藏後臺的婚外親密關係，若想在前臺扮演合乎社會期待的母親，最重要的劇碼是透過通訊科技來表達對子女的關心，此亦回應前一節所提出的不同共在模式。但更為重要的是，即便處於共在的狀況，移工媽媽仍須仔細拿捏資訊，讓共在恰如其分地成為履行母職的方式，又不戳穿前臺角色的破綻。隨著社群媒體上可揭露的資訊變多，移工媽媽被期待要分享更多日常瑣事，前後臺的界線更容易被滲透，身分整飾也加倍不易。從珮莉到珍娜的例子，既可從她們對婚外親密關係的態度——擁有婚外親密關係是否代表母親失格——看出各人心中母職圖像的差異，前後臺的管理也在科技更迭下，因社群媒體的加入而變得綿密和謹慎。

最後，婚外親密關係本身，與母國文化的性別期待背道而馳，但移工媽媽也以經濟貢獻來填補和替代隨之而來的質疑。在珍娜的兩位大女兒得知她與安迪的關係後，珍娜盡力向她們解釋自己在臺灣工作的辛苦，以及賺錢改善家庭物質條件的成果。在那之後，珍娜更加省吃儉用、積極匯款回家，意在消解女兒的不信任。移工媽媽提供的經濟貢獻，讓她們得以從看似偏離好母親的航道扭轉回來。此亦可見，在臺擁有伴侶的移工媽媽，絕不代表已將母國家人拋諸腦後；相反地，她們尋

求情感上的互相扶持，努力在異國他鄉維持生活，並且依然透過細密的時間安排來兼顧不同身分，善盡她們所能做到的經濟匯款或日常通訊。

二、展現特定資訊：以「共在」換取個人的自由空間

除了把可能破壞前臺身分的資訊按下不提，移工媽媽也以揭露特定資訊的方式來操作共在，換取個人的自由空間。積極跟子女互動的同時，移工媽媽的休息時間勢必會被擠壓，她們必須把握珍貴的時間，做出最大化的利用，而直播恰為她們提供了一邊休息一邊履行母職的可能。直播並不限制雙方都得在場，隨性開起直播的移工媽媽可以把當下轉化成影像，再保留紀錄以供事後觀看。當移工媽媽會跟朋友一同出門逛街、放鬆，即便只是坐在公園或車站大廳聊天，她們仍會開啟直播來紀錄日常；就算沒有人在線觀看，移工媽媽還是會積極地對著鏡頭解說、把風景記錄下來，以便子女事後透過影片一同經歷當下的感受。移工們看似不在乎旁人眼光地對著鏡頭講話，有時是正在跟留言區互動，但更多時候是相信錄下的素材可以成為往後回憶的憑藉，乃至是回應子女對母親在臺生活的疑問。認真經營串流平臺帳號的羅德琳則是將零散的直播素材進一步剪輯成精彩的生活片段，放回串流平臺或臉書上，這對她和女兒來說就像是「雲端相簿」，能隨時讓女兒了解自己的生樣貌。直播擴展了母職實作的多重樣貌，也體現時間對移工媽媽而言是重要的資源，她們既要滿足休閒娛樂，也得達到形象展演、母職實作的功能。透過直播的紀錄，移工媽媽把休假日攤開讓子女檢視，不僅達到了分享生活的意義，更讓她們免於被懷疑是離家享樂的指摘。

此外，移工媽媽以訊息和直播留存檔向子女報備行蹤，亦使她們得以於「不共在」的狀況下達到親子維繫的效果。研究者曾和珍娜、潔雅

在聖誕節前出遊，看著街上絢麗的彩燈裝飾，潔雅一路都拿著自拍棒拍照及錄影，原本以為她會撥打視訊電話給母國的三個子女，讓孩子們遠端感受聖誕氛圍，但潔雅卻搖搖頭，表示她已先告知子女今天會出門的消息，之後再傳照片與他們分享即可。珍娜更是在一旁附和，表示這是難得感到真正放鬆的時刻，必須把握當下，罕見地用中文說道：「這是我們的『放假』！」她們在聖誕樹前拍了許多照片，潔雅馬上打開通訊軟體，挑選了幾張照片傳送給三個孩子，研究者趁機追問潔雅，是否想要跟子女通電話來分享這些景象和喜悅，她再次答道：

我有傳訊息給他們了，他們知道我今天難得放一天假，知道在這裡、我出來玩，那就不用再跟他們講什麼了，他們看到照片就會知道了……我們過好我們自己的就好了。（菲律賓移工，潔雅）

同樣的，珍娜也沒有和子女直接聯絡，而是選擇傳送訊息和影片。那天稍晚，潔雅在臉書上連續發了三篇貼文及數則限時動態，貼文中並未分享太多當天出遊的細節，反而標注了她的三個小孩，公開祝他們聖誕快樂。沒過多久，子女分別來留言回覆聖誕快樂，包括「媽媽，我想你」、「我愛你」等語句，其中也不乏有許多親友留言表示羨慕。隔週再次見到潔雅時，她主動提起貼文的按讚人數和留言，並說道：「你看，我的小孩沒有（對這件事）說什麼，我傳訊息他們就知道我在哪裡了，他們看到照片也都很開心。」

潔雅雖然多數時候都採取陪伴性共在的策略，跟母國子女保持長時段的聯繫，卻也有不想被打擾的個人時光。以照片為證，潔雅向子女報備去向，並透過讓行程透明化，免於被質疑為是成日玩樂的不負責任母親。更為重要的是，潔雅向子女報備和回應的態度，也呼應了珍娜的說

法。珍娜所強調的「放假」不只是作為工廠工人的休息，更是身為母親忙裡偷閒的時刻。她們每日忙於在工人和母親的身份間穿梭，希望在難得的休假日中放下重擔好好享受一番。潔雅和珍娜透過訊息來交代生活，乃至透過臉書貼文來展現自己對子女的掛念，種種作法讓她們即便沒有持續維持「共在」，也能對母親身份有所交代。換言之，休假日的出遊原是移工媽媽的後臺，但她們傳訊息或發文告知子女的作法，反而巧妙借助了社群媒體的效果，透過揭露特定資訊來讓這件事成為能夠展演母職的平臺，使她們獲得更多從事個人休閒娛樂的自由。

移工母國社會文化的結構性條件，形塑了移工媽媽需出演的母職劇碼，印尼或菲律賓社會皆強調女性的照顧者角色。因此，移工們不時關心子女動向、提供情緒支持，以回應社會期待的好母親角色。不過，海外工作本身，既履行和擴大母職意涵（梁莉芳，2024），也變相鬆動了以父權為主導的結構。移工媽媽對母國家庭提供實質的經濟貢獻，讓她們有時可遊走在照顧者和養家者的角色之間，透過遠距通訊科技來選擇性地「共在」或隱藏。

柒、結論

跨國母職挑戰了主流的密集母職育兒方式，用經濟貢獻取而代之，造就以養家者身份遠距育兒的母親形象（Hondagneu-Sotelo & Avila, 1997; Madianou, 2012; Parreñas, 2005）。對本文的移工媽媽而言，出國工作本身被整併成母職策略的一環，致力於讓孩子們不必受家庭社經地位所牽連，而能獲得更多經濟上的幫助。然而，她們也並非一腳從照顧者跨到養家者，而是不斷來回平衡、協商、重塑母職內涵的過程，並且依舊希望彌補缺場的遺憾，所以在擔負經濟責任的同時，也努力回應母

國社會的性別角色期待，形成兼顧養家和照顧的母職策略。

本文以民族誌和訪談的材料，討論移工媽媽如何以通訊科技來進行跨國母職，並用前后台理論來凸顯跨國狀態下母職劇碼所遭遇的衝突，以及媽媽們採用的修補策略。跨國交流以製造共在為軸，但過往科技母職研究對於共在的討論，卻經常把通訊科技中不同的功能和特性混在一起，講述一個模糊的「共同在場」可能性。本文認為虛擬在場在實作上會因應家庭形式、與子女關係、聘僱狀況的不同，而有不同的邏輯和目標。換言之，即便通訊科技提供了多種交流管道，時間及精力皆有限的移工媽媽，仍得根據彼此的關係特性來擬定最適合的策略，而非僅是從工具箱中把通訊科技抓出來使用。

不過，指認不同的共在邏輯，並不意在渲染移工媽媽無所不用其極地積極當媽媽，或是以全心投入母職的案例來製造焦慮。相反地，跨國母職不可避免地會遇到意外和挫折，從兩種共在的理念型中皆可看見親子衝突不時發生，移工媽媽需要調整互動方式或訴諸他人幫忙。此外，移工也得因應雇主要求、工作時間進行調整，讓跨國交流在工作的日常實現。因應工廠的排班與加班，廠工通常只能利用零碎的休息時間與子女聯繫，多依賴掌握性的共在。看護工的工作時間雖然高度依附於雇主家庭的需求，但照顧過程中有機會跟雇主彈性協商，獲得雇主允許時，能透過視訊建立互動，甚至將聯繫時間固定於日常生活的節點，如早餐或晚餐時段，從而實現陪伴性的共在。然而，當雇主限制交流或工作排擠私人時間時，看護工也可能被迫採取與廠工相似的策略，以間斷的訊息交換來維繫關係。與此同時，雇主如何看待和支配勞動力，也會影響移工在工作場域的處境。進一步而言，移工媽媽的母職實作，既受到母國性別分工與文化規範的影響，也在勞動體制中被重新形塑。

借重前後臺的理論，本文的另一個重要論點在於，移工媽媽並非只

將科技媒介用於製造共在，而也將社群媒體轉為展演母職的前臺，出演為子女犧牲的母職劇碼。再者，管理前後臺的方式，也隨著科技媒介的發展變得更加細密。本文發現移工媽媽會透過兩種方式來維護形象，其一是掩飾不欲人知的資訊，包括避免在談話或社群媒體上論及相關資訊，藉以積極控制某些可能破壞互動的資訊，把在臺的個人生活壓在虛擬共在的表面之下。其二則是刻意傳遞特定訊息，例如主動開啟直播來紀錄休假日生活，或傳訊息及照片向子女報備生活；選擇性地讓子女有機會窺探後臺的狀況，其實是變相表現自己忠於母職的方式。綜上所述，科技媒介及社群媒體的出現確實改變了跨國母職的樣貌，不只是以製造共在為軸來打造跨國社會互動，也影響了互動下的前後臺界線，促使移工媽媽不斷更新和調整對應的印象整飾策略，以免讓子女誤入在臺休閒的後臺，造成形象表演的斷裂。而移工媽媽之所以能選擇性地出演母職劇碼，也與海外工作所帶來的經濟貢獻有關。從家庭內部的動力來看，當移工媽媽居於經濟上的權力位置，雖然未能完全消解父權結構下的不平等，卻也為她們爭取到了得以發展個人生活與關係的空間。

本文分析限制在於，田野與訪談資料主要以移工媽媽為主，缺乏子女或其他母國家人視角的系統性探討。不過，在田野過程中，研究者也能從母國子女在通話或視訊中的反應，窺見他們對交流的看法。例如，母國子女會多次拒接電話，傳訊息表示自己正在讀書或玩電腦；或是以煩躁的語氣回應移工媽媽，暗示想要盡快結束通話。移工媽媽雖然能以網路資源作為籌碼，要求子女在某時或某地接聽電話，子女卻也會採取軟性抵抗，且往往讓移工媽媽感到沮喪，或反思目前的交流方式。跨國母職並非單向的親職實踐，而是嵌入跨國權力結構的互動過程，未來研究若可納入母國家人之視角，則能進一步討論通訊科技如何在其中扮演雙重角色——既是情感維繫的橋樑，也可能成為家庭內部權力協商的場

域。

女性移工的生活不只有工作和做媽媽，也有個人喘息的空間。在討論跨國母職圖像之餘，需謹慎為之，不該以道德觀點來檢視移工母職實作，或把性別分工下的母親角色框架強加在移工媽媽身上，而是該拆解這套性別腳本，看見內部的異質。

參考書目

- 林津如（2000）。〈“外傭政策”與女人之戰：女性主義策略再思考〉，《台灣社會研究季刊》，39，93-151。https://doi.org/10.29816/TARQSS.200009.0003
- 夏曉鶄（2002）。〈菲律賓移駐勞工在台灣的處境〉，《台灣社會研究季刊》，48，219-234。https://doi.org/10.29816/TARQSS.200212.0007
- 夏曉鶄（2005）。〈全球化下台灣的移民／移工問題〉，瞿海源、張苙雲編《台灣的社會問題 2005》，頁 328-367。巨流。
- 曾嫻芬（2004）。〈引進外籍勞工的國族政治〉，《臺灣社會學刊》，32，1-58。https://dx.doi.org/10.6786/TJS.200406.0001
- 梁莉芳（2024）。〈跨國／時做媽媽：印尼家庭看護移工的母職實作、協商策略和心理矛盾〉，《臺灣社會學刊》，75，1-53。https://dx.doi.org/10.6786/TJS.202406_(75).0001
- 黃思齊（2011）。《永恆聯繫，輕連結，強控制：手機愛情故事》。臺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台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https://hdl.handle.net/11296/h3p8u6
- 張旺山譯（2013）。〈社會科學的與社會政策的知識之“客觀性”〉，張旺山（譯）《韋伯方法論文集》，頁 171-242。聯經。（原文 Weber, M. [1904]. Die “Objektivität” sozialwissenschaftlicher und sozialpolitischer Erkenntnis, *Archiv für Sozialwissenschaft und Sozialpolitik*, 19, 22-87.）
- 藍佩嘉（2002）。〈跨越國界的生命地圖：菲籍家務移工的流動與認同〉，《台灣社會研究季刊》，48，169-218。https://doi.org/10.29816/TARQSS.200212.0006
- 藍佩嘉（2007）。〈性別與跨國遷移〉，黃淑玲、游美惠編《性別向度與臺灣社會》，頁 225-248。巨流。
- 藍佩嘉（2008）。《跨國灰姑娘：當東南亞幫傭遇上台灣新富家庭》。行人。

- 藍佩嘉 (2014)。〈做父母、做階級：親職敘事、教養實作與階級不平等〉，《台灣社會學》，27，97-140。https://doi.org/10.6676/TS.2014.27.97
- 藍佩嘉 (2019)。《掙教養：全球化、親職焦慮與不平等童年》。春山。
- Asis, M. M. B., Huang, S., & Yeoh, B. S. A. (2004). When the light of the home is abroad: Unskilled female migration and the Filipino family. *Singapore Journal of Tropical Geography*, 25(2), 198-215. https://doi.org/10.1111/j.0129-7619.2004.00182.x
- Baldassar, L. (2007). Transnational families and the provision of moral and emotional suppor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uth and distance. *Identities*, 14(4), 385-409. http://dx.doi.org/10.1080/10702890701578423
- Baldassar, L. (2008). Missing kin and longing to be together: Emotion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co-presence in transnational relationships.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Studies*, 29(3), 247-266. http://dx.doi.org/10.1080/07256860802169196
- Baldassar, L., Nedelcu, M., Merla, L., & Wilding, R. (2016). ICT-based co-presence in transnational families and communities: Challenging the premise of face-to-face proximity in sustaining relationships. *Global Networks*, 16(2), 133-144. http://dx.doi.org/10.1111/glob.12108
- Ballaret, J. R., & Lanada, J. P. (2021). Mothering from a distance: The lived experiences of Filipina transnational mothers in Singapore. *The Family Journal*, 30(4), 507-513. https://doi.org/10.1177/10664807211061833
- Chan, C. (2017). Not always 'left-behind': Indonesian adolescent women negotiating transnational mobility, filial piety and care. *The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Anthropology*, 18(3), 246-263. https://doi.org/10.1080/14442213.2017.1311372
- Chib, A., Malik, S., Aricat, R. G., & Kadir, S. Z. (2013). Migrant mothering and mobile phones: Negotiations of transnational identity. *Mobile Media & Communication*, 2(1), 73-93. http://dx.doi.org/10.1177/2050157913506007
- Christensen, T. H. (2009). "Connected presence" in distributed family life. *New Media & Society*, 11(3), 433-451. http://dx.doi.org/10.1177/1461444808101620
- Demirsu, I. (2022). Watching them grow: Intergenerational video-calling among transnational families in the age of smartphones. *Global Networks*, 22(1), 119-133. http://dx.doi.org/10.1111/glob.12334
- Dewi, E. (2011). Changing perceptions of "good" mothering and family roles among Indonesian female domestic workers. *Journal of the Motherhood Initiative for Research and Community Involvement*, 2(2), 208-225.
- Diminescu, D. (2008). The connected migrant: An epistemological manifesto. *Social Science Information*, 47(4), 565-579. http://dx.doi.org/10.1177/0539018408096447
- Dow, D. M. (2019). *Mothering while black: Boundaries and burdens of middle-class parenthoo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Finch, J. (2007). Displaying families. *Sociology*, 41(1), 65-81. https://doi.org/10.1177/0038038507072284
- Fresnoza-Flot, A. (2009). Migration status and transnational mothering: The case of Filipino

- migrants in France. *Global Networks*, 9(2), 252-270. <https://doi.org/10.1111/j.1471-0374.2009.00253.x>
- Glenn, E. N., Chang, G., & Forcey, L. R. (Eds). (1994). *Mothering: Ideology, experience, and agency*. Routledge.
- Goffman, E. (1959). *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 Anchor Books.
- Gorfinkiel, M. D. (2011). Migrant domestic work and changes in the ideas of childcare. *Journal of Comparative Family Studies*, 42(5), 739-749. <http://dx.doi.org/10.3138/jcfs.42.5.739>
- Hays, S. (1998). *The cultural contradictions of motherhood*. Yale University Press.
- Hondagneu-Sotelo, P., & Avila, E. (1997). "I'm here, but I'm there": The meanings of Latina transnational motherhood. *Gender & Society*, 11(5), 548-571. <https://doi.org/10.1177/089124397011005003>
- Horst, H. A. (2006). The blessings and burdens of communication: Cell phones in Jamaican transnational social fields. *Global Networks*, 6(2), 143-159. <http://dx.doi.org/10.1111/j.1471-0374.2006.00138.x>
- Irawaty, D. (2021). Considering the role of money and gifts in the (re)-construction of motherhood and family among Indonesian transnational female domestic workers. *IKAT: The Indonesian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4(2), 89-111. <https://doi.org/10.22146/ikat.v4i2.61570>
- Lan, P. C. (2018). *Raising global families: Parenting, immigration and class in Taiwan and the US*. Stanford University. <http://dx.doi.org/10.1515/9781503605916>
- Lan, P. C. (2022). Shifting borders and migrant workers' im/mobility: The case of Taiwan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Asian and Pacific Migration Journal*, 31(3), 225-246. <https://doi.org/10.1177/01171968221127495>
- Lam, T., & Yeoh, B. S. A. (2016). Migrant mothers, left-behind fathers: The negotiation of gender subjectivities in Indonesia and the Philippines. *Gender, Place & Culture*, 25(1), 104-117. <https://doi.org/10.1080/0966369X.2016.1249349>
- Lareau, A. (2003). *Unequal childhoods: Class, race, and family lif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Levitt, P. (2001). *The transnational villager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Levitt, P., & Jaworsky, B. N. (2007). Transnational migration studies: Past developments and future trend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33(1), 129-156. <http://dx.doi.org/10.1146/annurev.soc.33.040406.131816>
- Levitt, P., & Schiller, N. G. (2004). Conceptualizing simultaneity: A transnational social field perspective on Society.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38(3), 1002-1039. <http://dx.doi.org/10.1111/j.1747-7379.2004.tb00227.x>
- Licoppe, C. (2004). 'Connected' presence: The emergence of a new repertoire for managing social relationships in a changing communication technoscape.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22(1), 135-156. <https://doi.org/10.1068/d323t>
- Madianou, M. (2012). Migration and the accentuated ambivalence of motherhood: The role

- of ICTs in Filipino transnational families. *Global Networks*, 12(3), 277-295. <http://dx.doi.org/10.1111/j.1471-0374.2012.00352.x>
- Madianou, M., & Miller D. (2013). *Migration and new media: Transnational families and polymedia*. Routledge.
- Massey, D. (1994). *Space, place, and gender*.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McKay, D. (2007). 'Sending dollars shows feeling' – emotions and economies in Filipino migration. *Mobilities*, 2(2), 175-194. <http://dx.doi.org/10.1080/17450100701381532>
- Nedelcu, M. (2012). Migrants' new transnational habitus: Rethinking migration through a cosmopolitan lens in the digital age. *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 38(9), 1339-1356. <http://dx.doi.org/10.1080/1369183X.2012.698203>
- Nedelcu, M., & Wyss M. (2016). 'Doing family' through ICT-mediated ordinary co-presence: Transnational communication practices of Romanian migrants in Switzerland. *Global Networks*, 16(2), 202-218. <https://doi.org/10.1111/glob.12110>
- Oishi, N. (2005). *Women in motion: Globalization, state policies, and labor migration in As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Parreñas, R. S. (2000). Migrant Filipina domestic workers and the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reproductive labor. *Gender and Society*, 14(4), 560-580. <http://dx.doi.org/10.1177/089124300014004005>
- Parreñas, R. S. (2001). Mothering from a distance: Emotions, gender, and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 in Filipino transnational families. *Feminist Studies*, 27(2), 361-390. <http://dx.doi.org/10.2307/3178765>
- Parreñas, R. S. (2004). The care crisis in the Philippines: Children and transnational families in the new global economy. In B. Ehrenreich, & A. R. Hochschild (Eds.), *Global woman: Nannies, maids, and sex workers in the new economy* (pp. 139-172). Henry Holt and Company.
- Parreñas, R. S. (2005). Long distance intimacy: Class, gender and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 between mothers and children in Filipino transnational families. *Global Networks*, 5(4), 317-336. <http://dx.doi.org/10.1111/j.1471-0374.2005.00122.x>
- Silvey, R. (2007). Mobilizing piety: Gendered morality and Indonesian–Saudi transnational migration. *Mobilities*, 2(2), 219-229. <https://doi.org/10.1080/17450100701381565>
- Sooryamoorthy, R., Miller, B. P., & Shrum, W. (2008). Untangling the technology cluster: obile telephony, internet use and the location of social ties. *New Media & Society*, 10(5), 729-749. <http://dx.doi.org/10.1177/1461444808094354>
- Suárez-Orozco, C., Todorova, I. L. G., & Louie, J. (2002). Making up for lost time: The experience of separation and reunification among immigrant families. *Family Process*, 41(4):625-643. <https://doi.org/10.1111/j.1545-5300.2002.00625.x>
- Suryakusuma, J. I. (1996). The state and sexuality in New Order Indonesia. In L. J. Sears (Ed.), *Fantasizing the feminine in Indonesia* (pp. 92-119). Duke University Press.
- Tiamzon-Abiera, A. G. (2024). Filipino notion of motherhood: A hermeneutic phenomenological analysis. *Asian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and Management*

- Technology*, 6(6), 122-127.
- Uy-Tioco, C. (2007). Overseas Filipino workers and text messaging: Reinventing transnational mothering. *Continuum: Journal of Media & Cultural Studies*, 21(2), 253-265. <http://dx.doi.org/10.1080/10304310701269081>
- Warikoo, N. (2022). *Race at the top: Asian Americans and Whites in pursuit of the American dream in suburban school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http://dx.doi.org/10.7208/chicago/9780226819334.001.0001>
- Waruwu, B. K. (2021). Smartphone mothering and mediated family display: Transnational family practices in a polymedia environment among Indonesian mothers in Hong Kong. *Mobile Media & Communication*, 10(1), 97-114. <http://dx.doi.org/10.1177/2050157921998408>
- Wilding, R. (2006). 'Virtual'intimacies? Families communicating across transnational contexts. *Global networks*, 6(2), 125-142. <https://doi.org/10.1111/j.1471-0374.2006.00137.x>

Transnational Mothering in “Co-Presence”: Emotional Connections and Impression Management among Southeast Asian Migrant Workers

Chih-Hsuan, Chang *

ABSTRACT

Ever since the Taiwan government initiated the recruitment of Southeast Asian migrant workers in the early 1990s, their numbers have increased greatly. While the literature has primarily focused on their working conditions, I instead argue that workers' migratory experience encompasses multiple roles and positions shaped by transnationalism. Indeed, the influence and expectations from their home countries should not be overlooked. Female migrant workers, as gendered subjects, work abroad to support their families while bearing the gendered expectations of child-rearing. Their experiences reveal the paradox and dynamics of negotiating the dual roles of breadwinner and caregiver across borders.

With the advanced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CT), migrant mothers maintain emotional and communicative ties with their left-behind children. ICT has thereby shaped new forms of transnational motherhood and maternal performance. As everyday life becomes increasingly mediated and visible, migrant mothers must engage in

* Chih-Hsuan Chang is a master's student in the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Her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gender, race and ethnicity, and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E-mail: chihhsuan.ntusoc@gmail.com.

ongoing identity management, navigating between frontstage and backstage performances of motherhood.

This paper presents how Southeast Asian migrant mothers utilize ICT to perform transnational motherhood, sustain long-distance family relationships, and navigate diverse parenting goals. I discuss how migrant mothers balance their pursuit of personal life with the moral expectations associated with being physically separated from their families. This especially arises in cases where they have formed new intimate relationships in Taiwan.

To examine how ICT mediates transnational motherhood, I conducted three years of ethnographic fieldwork and in-depth interviews to investigate migrant mothers' mothering practices. I regularly visited a migrant 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 (NGO) that has promoted migrant workers' labor rights for years, as well as its affiliated shelter. Migrant workers gather at this NGO every Sunday, and some have temporarily settled in the shelter. During the fieldwork, I spent most of my time observing migrant mothers' interactions with their children. They sometimes even allowed me to join their video calls and shared their opinions, providing insights into how migrant mothers interpret these cross-border interactions. After nearly a year of fieldwork, I then interviewed ten migrant mothers: six Filipinas and four Indonesians. The proportion of factory workers to caregivers is approximately one to three. To reduce language barriers, the interviews were conducted in the languages most comfortable to the participants, including their native tongues. I responded in Chinese, English, or Indonesian, depending on the context.

As previous scholars have pointed out, migrant mothers' practices primarily relate to creating co-presence, through which ICT helps project a sense of presence back into the family. Building on this, I conceptualize two forms of co-presence: participatory co-presence and accompanying co-presence. I further argue that the strategies mothers adopt are influenced by

both their occupational roles and their children's ages.

At the core of participatory co-presence is staying informed about their children's schedules and giving appropriate advice. As some left-behind children enter adolescence, migrant mothers focus on ensuring their children behave appropriately and successfully pursue higher education. Although they may not always have time to be online simultaneously, they rely on messages to exchange information and express care. This form of text-based communication is more flexible, allowing both sides to reply later at their convenience. It is often supplemented with brief phone calls, about ten minutes each, for maintaining daily connections. After keeping track of their children's daily lives, migrant mothers take on the role of guiding and offering advice. Through these interactions, they project their maternal presence into significant moments of their children's growth.

While accompanying co-presence aims to cultivate a sense of being together, migrant mothers use video calls or live streaming instead of texts or brief phone calls. These video calls usually last for at least 30 minutes. Since some children are too young to focus on extended conversations or articulate their emotions clearly, migrant mothers initiate video calls during routine moments, such as breakfast or dinner. The focus is not on verbal sharing, but on maintaining a sense of connection through virtual companionship. Migrant mothers attempt to compensate for their physical absence, creating a feeling of closeness as if they are still present in their children's daily lives.

The strategies for creating co-presence vary according to migrant mothers' occupations. Factory workers, for instance, are subject to strict time regulations on the production line and can only reply to messages or return calls after work. As a result, they tend to adopt participatory co-presence. In contrast, I find that caregivers, contrary to common assumptions, negotiate with their employers and gain permission to use their phones while their

patients are resting. This allows them to manage time more flexibly. Most caregivers adopt accompanying co-presence, but in cases where migrant mothers cannot access their phones during work, they continue to rely on participatory co-presence.

While the previous section notes how migrant mothers use ICT to maintain emotional bonds, the second section explores a different yet related dimension: how they manage moral expectations and maternal identity through self-presentation on digital platforms. Migrant mothers gain flexibility for personal leisure activities by selectively managing their self-presentation on social media. They may conceal aspects of their personal lives that could challenge their maternal image or conversely explicitly display their sacrifices in response to expectations as responsible mothers. During their free time, rather than frequently texting or calling, migrant mothers post selected moments on social media. These posts serve to inform their children of their whereabouts and routines.

Migrant mothers' fundamental economic contribution, particularly through remittances, has reshaped and broadened the meaning of being a good mother. For instance, one interviewee shared how she emphasized her hard work in response to her daughter's doubts about her intimate relationship in Taiwan. She justified her choices by pointing to the improved material conditions of her family back home, using it as evidence of her ongoing commitment to her maternal role. These practices of concealing and displaying selected aspects of their lives demonstrate how ICT enables migrant mothers to perform and negotiate their maternal roles across distances.

This paper highlights that the understanding of transnational motherhood should not be confined to traditional gendered expectations. Through the strategic use of ICT, migrant mothers not only sustain emotional connections and provide care across borders, but also negotiate their moral identities and

claim personal space. These practices both challenge and expand the meaning of motherhood, revealing a more heterogeneous and dynamic form of maternal subjectivity shaped by migration, labor, and technology.

Keywords: co-presence, impression management, Southeast Asian migrant workers,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CT), transnational motherhood

• 新聞學研究 • 第一六四期 2025 年 7 月